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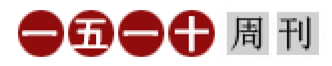


**【编者的话】**

黄岩岛事件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中菲两国仍未能在主权问题上达成一致立场，甚至到了以武力相威胁的地步，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5 月 15 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再度就黄岩岛事件表态，强调中国政府维护黄岩岛领土主权的决心是坚定的。5 月 16 日，菲律宾外交部长德尔罗萨里奥表示，菲希望能与中国很快结束在黄岩岛海域持续的对峙事件，以便两国恢复“正常的关系”。

从钓鱼岛到南中国海，中国与邻国的涉海领土纷争持续不断。本期周刊中，BBC 中文网用问答的形式为您概述了南海种种争议的起因以及各国的态度。而南海主权之争大都围绕着俗称








“九段线”的当代中国南海疆界线而起，通过毛剑杰的回顾，读者可以了解南海断续国界线的形成过程。

简单回顾之后，本期周刊试图从具体的南海争端抽离，重新审视“边疆”这一概念。

边疆多事，往往与领土有关，而领土之争又常常掀起民族主义情绪，产生一系列问题。关凯认为，“‘边疆’之谓的本质，并非单单指向地域，也和文化有关。”因此，“处理边疆问题的核心，不仅是要维护国家主权，也是要构建社会的文化秩序。”刘晓原通过分析中国在领土属性上由“边疆国家”迈向“整合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边疆地区易发生动乱的原因，他认为“民族国家的框架成功地把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圈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但一个能将中国内地和民族边疆的自发能动力导向同一方向的共同的伦理心态尚待形成。”而施展的文章则回溯西方历史，试图借鉴英美与苏联的经验，以寻求中国边疆问题的解决之道。

另一方面，边疆这个概念并非自古就有，用历史的眼光看，过去那个不分国界的时代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在“从边陲看中国”的论坛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在边疆地区的人们“对国界的某种蔑视”，梁文道说：“今天在我们面对非常猖獗的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背后的中原中心主义的时候，我们需要用这样的一种南方海洋的角度来重新看它。”

葛兆光的文章通过历史、文化和政治三个维度来认识“国境”、“国家”与“中国”，使读者在中国和周边世界关于国界、疆域、历史的争论中保持一个清晰的概念。葛剑雄则指出，不同时期、民族、地区对中国认同有不同的看法，扩张的概念绝不仅仅是文化，不能简单地都认为是正义。

1510 周刊由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 目　录



在 Facebook 分享本期周刊
在 Twitter 分享本期周刊
在饭否分享本期周刊
在新浪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网易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腾讯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搜狐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人人网分享本期周刊
在豆瓣分享本期周刊



# 【争】

## 8-1 BBC 中文网：问与答——南中国海争端

**“就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不同的国家争议由来已久。但近期紧张局势加剧，引起国际关注，担心其成为影响全球的冲突爆发点。”**

就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不同的国家争议由来已久。但近期紧张局势加剧，引起国际关注，担心其成为影响全球的冲突爆发点。

**争端何在？**

主权争议在于西方称为“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为“西沙群岛”、越南称为“黄沙群岛”）和西方、马来西亚、印尼等称为“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为 “南沙群岛”、越南称为“长沙群岛”、菲律宾称为“卡拉扬群岛”）。除了岛屿外，还有几十个无人居住的礁、滩、暗沙等。包括上述在内的国家对这片地区声称全部或部分主权。

**各国声称什么？**

中国声称拥有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北京称，对这一地区行使主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约 2000 年前的文献记载中。那时，“帕拉塞尔”和“斯普拉特利”两个群岛链已经被视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1947 年，中国政府公布地图，划明其声称的主权疆界（九段线）。之后，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也都继承了这一主权声明。

越南否认中国的南海历史说。越南说，中国在上世纪 40 年代之前从未对有关岛屿声称主权。越南称，这两大群岛链完全在越南的疆界之内。越南称，它自从 17 世纪就主动对两大群岛行使主权，并有历史文件为证。

菲律宾以其地理位置临近“斯普拉特利”群岛作为其主权声称的主要依据。它对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中沙群岛“黄岩岛”（菲律宾称为“斯卡巴洛礁”）有主权。



马来西亚和文莱也跟据 1982 年公布的《联合国海洋法》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或岛屿声称主权。

**为何争议多多？**

这一大片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部分尚未开发。科学家预计这一地区海底还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矿藏。

美国能源信息机构称，中国官员对这一地区的矿藏提出了最乐观的估计。他们援引中方估计这一地区可能蕴藏的石油资源高达 2130 亿桶——10 倍于美国可证实自己领土拥有的石油蕴藏。而美国科学家预计，这一地区的石油蕴藏量为 280 亿桶。

而根据美国能源信息机构，这一地区真正的财富是天然气，蕴藏量预计是 25 万亿立方米，相当于卡塔尔国家可证实的天然气蕴藏量。

这里也是该地主要航道之一，还有丰富的渔业资源。

过去，为争夺对这里的控制，有关国家间出现多次摩擦和冲突，特别是中国和越南（南越）海军在西沙大战。菲律宾也分别与中国、越南和马来西亚发生过摩擦，特别是近期不断升温的黄岩岛之争引起国际关注。

**有无解决争议的努力？**

多年来，中国倾向于和有争议的国家举行不公开的双边谈判。而其他国家则努力推动国际仲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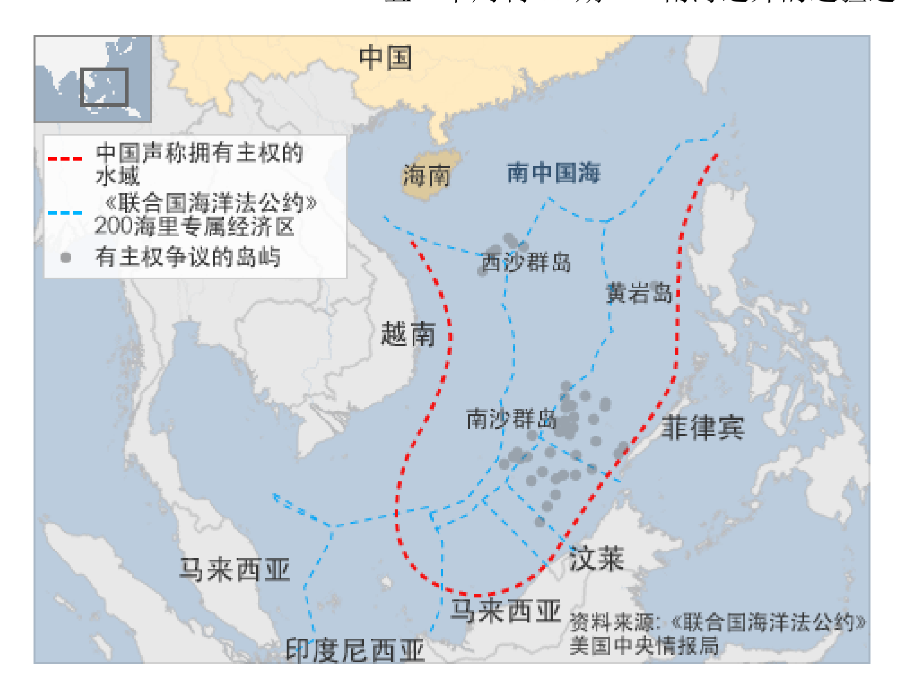
因此，2010 年 7 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介入争议，呼吁制定有约束性的行为准则。此举引起中国批评，称她的建议是攻击中国。

1982 年公布的《联合国海洋法》似乎是给解决争议提供框架，在实际上，该法造成更多相互重叠的主权要求，也没有阻止中国和越南继续其历史主权论。

菲律宾和越南都分别和中国制定双边协议，规定了在这一地区的行为准则，但这些协议未能改变争议状况。

东盟 2002 年和中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各国同意“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法律争端，不通过威胁或使用武力，而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

但近期的事件表明一些国家没有遵守这个协议的精神。




（BBC 中文网，中文新闻时事网站。原文链接：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indepth/2012/05/120512_qa_southchinasea.shtml ）

【返回目录】

# 8-2 毛剑杰：纸上谈疆
## ——南海断续的国界线是如何形成的？

**“二战前中国与东南亚殖民宗主国日本、法国之间的争议，由此转变成了二战后中国与新独立的东南亚邻国之间的争议，直至现在。”**

“吾国领域经累朝合并以来，至前清乾嘉以前可称全盛时代——今即渐为强者攫夺，然旧时领地何敢忘也。”

1933 年 4 月上旬，三艘法国军舰忽然出现在南沙中业岛海域，派人登岛升起了法国国旗，还拉着岛上渔民在旗下合影。仓促间，中国渔民王安庆手里还拿着二胡。

离岛前，法国人埋下了一个装有法文文书的玻璃瓶，不过当晚就被王安庆等人挖出来扔了。大约十天后，文昌县龙楼镇星光村渔民郑兰锭来到中业岛，爬上树把法国国旗也解了下来。

王安庆后来才知道，那段时间法国人占了南海好几个岛：自 1933 年 4 月 7 日至 13 日，法国西贡海洋研究所所长薛弗氏带着军舰和测量船，登上太平岛、中业岛、西月岛……算上 1930 年占领的东沙南威岛，共九座岛礁，是为“九小岛事件”。

法国对南海诸岛早有觊觎之心。1885 年将越南占为殖民地，尔后，法国政府就曾公开谈到“19 世纪初期安南嘉隆王与明命王时，均曾出征西沙，现安南既归法国所有，则西沙群岛亦当归法国所有”，并否认中国前清政府在 1909 年对西沙群岛的主权宣示“这种占领仅是武力的表现，从未得到正式的承认，如果要在法律上生效，只能假设西沙群岛在当时是无主地”。（1930 年 3 月，驻河内法国印支总督致法国殖民部信件）

对此，中华民国驻法国公使于 1932 年 9 月照会法国外交部强调，“根据国际法和习惯法，拥有远离大陆的一个岛屿的主要条件是最先的有效占领，换言之，是国民最先在那里定居，从而使其国家拥有这些领土。海南渔民在西沙群岛定居，并建造房屋和渔船以供其需要，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染指西沙于法无据，法国又将目光转移到了南沙群岛。

1933 年 7 月 19 日，法国发布对南沙九岛的占领告示，但同时承认其中二岛“已住有中国渔民”。

**U 形断续线雏形**

南沙九岛被占时，持续一个多月的中日长城血战，正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直到法方发布告示后，内忧外患中的民国政府才于 8 月 4 日指令外交部照会法方："中国政府在未经确定查明以前，对于法国政府占领之宣言，保留其权利。"

其后中国又向法国政府抗议："（法方）既称有琼崖的中国人住于该群岛以专渔业，又谓当时岛中住有华人，又谓其地有树叶搭盖之屋，有奉祀神人之像……是九岛者早有华人居住，并非无主之岛，法人已代我证明矣。"

并且，依照国际公法与惯例，"凡新发现之岛屿，其住民系何国民，即证明其主权属于何国，今该群岛中全为华人，其主权应属于我，自无置辩之余地矣!"

荒唐的是，日本政府也向法国提出了抗议，因 1933 年 4 月 10 日法军登上太平岛时，连日商也一并驱逐了，日本认为法方侵犯了其主权。

与此同时，民国政府外交部还要求法方将各岛名称及经纬度查明见复。法国外交部回复称"该九岛在安南、菲律宾间，均系岩石，当航路之要道，以其险峻，法船常于此遇险，故占领之，以使建设防险设备，并出图说明，实与西沙群岛毫不相关。"

面对如此局势，民国政府深感出版中国南海疆域详细地图的必要性，决定成立"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对疆域内各岛礁的中英文地名统一进行审定。在 1935 年 1 月编印的第一期会刊上，较详细地罗列了南海的 132 个岛、礁、滩的名称。并第一次将南海诸岛明确地分成东沙群岛（即今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今中沙群岛）和团沙群岛（今南沙群岛）。

1935 年 4 月，民国海军海道测量局完成实地测量后，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第二期专门绘制《中国南海各岛屿图》，确定了中国南海最南疆域线至北纬 4°，把曾母暗沙标在了疆域线之内。

1936 年，这幅地图被收入由地理学者白眉初主编的《中华建设新图》，另名为《海疆南展后之中国全图》，图中在南海疆域内标有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团沙群岛，其周围用国界线标明，以示南海诸岛同属中国版图，并再次确认北纬 4°最南国界线及对曾母暗沙的主权。这就是中国地图上最早出现的南海疆域线，也即今日中国南海地图上 U 形断续线的雏形。

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徐志良认为，该版地图继承了 1927 年屠思聪《中华海疆变迁图》中的海疆国界线画法，将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全围了起来，首次完整标绘了中国南海疆界线。自此以后，中国政府和地图出版界都沿用了这种画法。

**民初海图热**

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说，在 U 形断续线出现前，中国历代南海疆界线并无统一画法，而近代南海海疆勘测，则始于前清政府 1909 年西沙主权宣示。

1909 年 5 月 19 日，三艘飘扬着大清龙旗的木壳炮舰，驶入“或作苍蓝或作翡翠色”的南海，直奔西沙群岛。这支由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领的舰队，带了一支多达一百七十多人的考察队伍，包括官员、商人、测绘员、化验员、工程师、医生、各种工人等。除宣示主权、给西沙 15 个岛屿命名外，李准还利用出航前在广州和天津购得的英制测距皮尺、海上定位器、经纬仪等设备，对西沙、东沙、南沙三处群岛进行了测量和考察，获得了一份较详尽的海图。

在这份海图基础上，地图学家胡晋接、程敷锴在 1912 年出版的《中华民国边界海岸及面积区划图》中，绘出了南海疆界线。

民国初年，疆域政区消长和古今地名演变的沿革地理学，以及由此派生的地图测绘忽然大热，当时仅有关南海诸岛归入中国版图的历史地图，就出版了六十多个版本，中学大学普设地理及地图测绘学科，把同期源于西方科技的地质学、海洋学远远抛在了后面。这背后是近代中国疆域遭列强蚕食鲸吞、边疆问题与民族危亡纠缠交织的无奈。因此，变动频繁的边界线，便成为知识分子关切的热点。正如胡晋接先生在地图手书序言中说：“吾国领域经累朝合并以来，至前清乾嘉以前可称全盛时代——今即渐为强者攫夺，然旧时领地何敢忘也。”而胡程二人所绘地图的另一个资料来源，就是前清舆图资料、满清全盛时期至民国初年的《海疆变迁大势图》，这里出现了从日本海穿过对马海峡、冲绳、台湾东部、巴士海峡、南海南部一直到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再到缅甸南部港口的一条连续海疆线。继胡程之后，1927 年 5 月，民国时期另一位地图学家屠思聪出版了《中华最新形势图》，其中第七图为《中华疆界变迁图》。这张图里的疆界线标示为：从广西防城一直沿北部湾中、越中间线往南，在西沙群岛南部兜过中沙群岛，东北向一直穿过台湾海峡东部，延伸到东海及黄海的鸭绿江口。

疆界线之外，中国政府也注意到了对领土的法理保护。1931 年 6 月 24 日，国民政府为抵御西方列强的海上入侵，颁布“领海范围 3 海里令”，正式宣布中国采用当时国际社会已普遍认可的 3 海里领海宽度制度，从而结束了中国多年来没有规定领海宽度的历史。这是中华民国领海制度的开始。“同时它也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政府官员和地图学家们对海上疆域的视野。”（徐志良，《民国海疆版图演变与南海断续国界线的形成》）

**再起争议**

尽管民国政府在地图测绘层面、法理层面对维护南海权益进行了不懈努力，但效果终因处于国家战乱时期而打了折扣。南沙九岛事件中，民国政府与法国之间反复地驳斥交涉，始终没有结果。1933 年 12 月，法国驻交趾支那总督克劳泰默签署法令，把南沙群岛的这些小岛“合并”到了安南的巴地省。

1935 年到 1938 年间，日本又派军舰占领了南沙群岛。1939 年 3 月 1 日，日本将西沙、南沙群岛一并占去改为“新南群岛”，隶属当时日本占领的台湾高雄州高雄市。直至抗战胜利

后，中国政府根据《开罗宣言》规定收复台湾、进而在 1946 年 12 月收复南海诸岛，并于次年测绘出了南海诸岛地图，其中所标示的四大群岛名称，已与今天地图完全一致。

但南沙主权危机仍未彻底解决，重返印度支那的法国，仍有进军南沙群岛的企图。当投降日军尚在等候遣返时，法国就赶在中国部队进驻之前占领了南海若干岛屿，并经常派军舰在南海巡逻。

1946 年 10 月，法国军舰“切弗鲁德”号侵占南沙群岛的南威岛和太平岛，并在太平岛竖立石碑。对国民政府决定收复西沙、南沙群岛，法国还提出抗议，并派军舰“东京”号到西沙群岛，航至永兴岛时发现岛上已有中国军队驻守，于是改航至珊瑚岛，并在岛上设立了行政中心。

刚取得独立的菲律宾，也想赶在中国未完全接收西沙、南沙群岛之时下手。时任菲律宾外长季里诺于 1946 年 7 月 23 日声称：“中国已因南沙群岛之所有权与菲律宾发生争议，该群岛在巴拉望岛以西 200 海里，菲律宾拟将其合并于国防范围之内。”

**疆线与海权**

南沙主权纷争，也是“二战”后中国与苏联、印度等国间多起边界认定争议之一。为此，民国政府内政部于 1946 年 7 月 18 日设立内政部方域司，复旦大学地理系教授傅角今担任司长。

方域司负责测量勘查中国疆界、处理疆界纠纷、调整勘测行政区域划分等事宜，成立后即首先筹划收复南海诸岛事宜，同时对南海诸岛各岛群名称作了调整，按照诸岛所处地理位置，将“团沙群岛”改名“南沙群岛”、原“南沙群岛”改名“中沙群岛”。

方域司完成的另一件要务，是印制了《南海诸岛位置图》。该图在南海海域中标有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并在其四周标定了一条由 11 根断续线组成的 U 形线，后改为 10 条，其中南海 9 条，东海台湾与琉球群岛之间一条。

此环抱着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 U 形国界线，最南端标在北纬 4°曾母暗沙附近。这就是在中国南海地图上正式标出的 U 形断续线，被通称为“传统疆域线”，中国南海领土范围也由此具体化了。

方域司勾画南海疆界时，世界海权理念也在急剧变化。不久前，美国依靠“二战”中快速发展的海洋勘察技术，于 1945 年在墨西哥湾发现了分布在得克萨斯州沿海“大陆架”和海床中的石油。同年 9 月 28 日，当世界许多国家都还不知“大陆架”为何物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发表了《大陆架公告》，主张美国“对邻接其海岸公海下大陆架地底和海床的天然资源拥有管辖权和控制权”。（美国《大陆架公告》）。

由于美国面向两洋的大陆架宽度，大多自然延伸 200 海里到 300 海里之间，而南美一些在南太平洋海岸的国家，在加勒比海地区与美国海洋接壤、却又没有同样宽度大陆架的国家，海洋权益势必因此受损。为此，这些国家“创造”了一个与美国“大陆架宽度”大体相似的概念，即 200 海里领海权。

两个月后。墨西哥宣布其领海在 183 米等深线以内，尔后阿根廷、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等国相继确认了 200 海里领海权。

**“九段线”定型**

此时的中国，海洋技术勘测不足，也不知“大陆架主张”会带来哪些权益和后果。只是水道测量和岛礁勘测，显然无法按照美国《大陆架公告》的逻辑和技术规范发布《南海大陆架公告》，同样也不能按照南美国家口径，提出 200 海里领海权主张，于是只能以公开出版版图、归属行政管辖和发布岛礁名称对照表等形式，为南海断续国界线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提供国际法依据。

1948 年 2 月，中华民国内政部公开发行《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向国际社会正式宣布了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范围。其上用断续国界线来表示，“充分考虑了海洋的连通性和南海是太平洋交通要道的特点。”（许森安《南海断续国界线的内涵》）

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审定出版的《南海诸岛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也同样标绘了南海断续国境线，只是在 1953 年将 11 段断续线去掉北部湾、东京湾 2 段，改为 9 段断续线，地理位置上稍有调整。这就是俗称“九段线”的当代中国南海疆界线。

但南海主权之争仍未就此消停。1951 年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在最后草拟阶段忽然推翻了以往对中国南海主权的所有认定，仅写日本放弃对西沙和南沙群岛的一切权利，却没有明确指出将其归还中国。祸根由此种下：二战前中国与东南亚殖民宗主国日本、法国之间的争议，由此转变成了二战后中国与新独立的东南亚邻国之间的争议，直至现在。

（毛剑杰，《看历史》记者。原文链接：http://www.xfgjls.com/?action-viewnews-itemid-64949 ）

【返回目录】



# 【疆】

## 8-3 关凯：文化秩序中的国家与族群



**“解决边疆与族群问题的密码，或在边疆与族群之外。显然，一个美好的社会，是‘边疆’不再具有区分人群的意义，而回归到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

我们在言说“边疆”的时候，通常有两个指向：一是关于地理的，即“边缘的地域”，其所指并非地貌风物，而是与国家政治中心的地理关系；另是关于人的，即所谓“边民”——生活于边疆之人。实际上，凡能被称为“边疆”的所在，一般而言，多是因为生息于斯的“边民”有着与主流社会不同的文化。因此，“边疆”之谓的本质，并非单单指向地域，也和文化有关。

人以文化分群，居于不同地域之上。珠江三角洲远离北京，临大洋而面海外，在帝国时代曾一直被视为“边疆”。但今天却由于现代化的发展，而在文化意义上成为国家的“中心地带”之一。反之，甘肃、青海、贵州等地，虽无一寸边境线，却常被视为“边疆”地区，即使兰州市的地理位置本是坐落在中国领土的地理中心线上。

显然，在文化意义上，边疆是一种隐喻，没有国家与人群的分界，就无所谓边疆的存在。

**天下无疆**

现代社会的国际地缘政治版图，并非空穴来风，首先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不同人类社群各自不同的历史经历，塑造出不同中心观的历史想象。在这种想象之中，历史并非仅仅是一种对史实的描述，更是一种对过往经历的文化解释。而在这种解释之中，历史存在的意义之一，是规定了人群与地域的关系。

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一直强调边疆的存在。在儒家学说的解释中，“天下”是一体而非多元的，故而天子所在的皇城即为“天下”唯一的中心，此亦为“中国”之谓的圭臬。而代表天子统辖各地的总督、巡抚不过是天子爪牙的延伸，至于国力所限、爪牙延伸不至的地方，即

为“边疆”。传统上按方位区分的边疆并不包含地域的外围边界，因为“天下”本来就是只有中心而没有边界的全部世界。但“天下”却有一个内部的边界，这个边界就是儒家文明与非儒家文明的分界线，或者说礼仪之邦与蛮夷之地的分野。在前者看来，后者始终等待着被前者去“教化”，这是儒家文化中包含着的一种近乎宗教的使命感，也是所有自诩为普世价值的文明必然产生的优越感和责任意识。

因为有确定的文明中心，也因为拥有浩瀚强大的帝国，中华文明在与近代欧洲殖民主义力量碰撞之前，始终以“大一统”为政治伦理，坚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一种气象万千的帝国政治规范，以“有教无类”的文化观念包容无限可能的多样性，也以“华夷之辨”的分类方法在内部区分自我与他者。在儒家世界观之中，地域并不具备终极价值，那只是附属于四方之人的生活空间——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是也。一旦四方的蛮夷都被教化成孔孟之徒，“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就会成为现实。这是一个在想象中没有止境的文化工程，因为儒家文明的“边界”，在理论上就是“天圆地方”的穹庐终线，在那条“自然”造成的天地分界线之外，已经没有人类立足的空间了。

当然，儒家文化的这个天堂般的愿景，从来没有彻底实现过。作为一种在经济结构上植根于农业生产方式的文明，也或许因为儒家文明缺少了理性与逻辑的文化基因，“天下观”虽刻画了中国人深藏于心的政治与道德伦理，却并非一种科学学说。在近代殖民主义裹挟着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与工业文明的强大压力之下，儒教传统帝国的神性在 19 世纪中期之后渐行瓦解。“天下无疆”的想象，终于被“地球是圆的”这样的科学知识所颠覆，国家的地理边界也随之逐渐清晰起来。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踉踉跄跄地走上了现代化发展道路。至少从表面上看，来自西方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冲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点，那也是儒家文明第一次面对自己无法慢慢征服的“征服者”。费正清将之解释为“冲击—回应”论，在他以西方为中心的理论视野里，西方始终是以东方的文化导师和“精神救赎者”的形象出现的，西方的侵略是打破儒家社会传统文化惯性的唯一原动力。同样从表面上看，后来的历史发展似乎也证明了费正清学派的理论解释力，无论是共产主义、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也包括科学主义、现代性文化，这些文化特质流动的方向都是自西向东的，此即所谓“西学东渐”，或自顾面子地称之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实际上，这几乎是一种“华夷之辨”观念的西方变种，完全忽略了中国社会自身的诉求与能动。

**“亚洲的内陆边疆”**

尽管“民族”一词是近代产物，但在前现代时期，帝国内部的群体认同差异始终是存在的，只不过不用“民族”指称群体而已。长城就是这种帝国内部文化关系的物理写照。

在前现代时期，与中原相比，北方游牧部落人口更少、整体实力更弱，却长期对中原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因为游牧者的骑兵通常比农耕者的步兵更具战斗力，其生计，特别是灾年的生计，也更依赖于掠夺。明代及之前，修筑长城的浩大工程，在帝国内部构出一道“内陆边

疆”，这条分界线区隔开草原与农田，也在地理与文化上的意义上生产出“边疆”。也正是因此，研究蒙古学的拉铁摩尔写出了《亚洲的内陆边疆》，将中华帝国的疆域分成“长城内外”两大板块。近年来美国“新清史”学派秉承其思想基因，论述大清帝国并非中华王朝的延续，而是东亚的“鞑靼帝国”。清代满洲对中原的王朝统治，不过这个泱泱帝国的一部，而非全部。“中国本部”之说，由此纵横天下，中国的国家影像被族群化，成为“汉地”的代称。于是，即使在当下早已不具备实质社会意义的满汉族群分界，也在这种历史解释之中重现“满汉畛域”。然而，“新清史”的知识建构，并非仅限于解释历史，亦是对现代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解构。因为，任何国家的存在，首先都基于历史。改变了历史解释，就等于改变了国家安身立命的根基。

细究下来，这些关于历史的解释，实际上都自觉不自觉地采取了欧式民族主义的思维方式，从而陷入一种后殖民主义的知识迷宫。

“边疆”的文化内涵，是在与“中心”的对照关系之中生成的。拉铁摩尔“内陆边疆”说，其关键不在划分边界，而在区分中心。在这种区分方法的背后，正是民族主义的知识逻辑，农耕与游牧文明构成同一个不中断的帝国，显然不符合西方的经验。实际上，中华帝国时代“华夷之辨”的区分，并不等同于今日的“民族”概念；前现代时期儒家文明以文化区分人群的方法，也并不能脱离儒家文明作为普世价值的历史语境；长城的构建，并非现代意义上国家主权的分界，而是类似乡间关系不睦的邻里在房前屋后树立起来的樊篱。在这道樊篱之外，是被区隔的双方共有的世界——那是同一个“天下”，同一个“天子”，同一个政治共同体。即使天子来自蒙古、满洲，其法统仍是儒家式的“承天命而治天下”。

常被忽略的是，欧式民族主义透镜中的世界图景，其实很荒诞。

今天生活在从中东欧到中亚辽阔地域上的各国人，并未把纵横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视为自己的祖先，尽管并不恪守族内婚的蒙古黄金家族曾在数百年中是他们祖先的统治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名著《想象的共同体》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民族解放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是拉丁美洲的独立国家。那些西班牙殖民者的后裔在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之后，在文化上将印第安人追溯为自己的祖先，而他们真正的祖先恰是印第安人的残酷杀戮者。

**边疆概念的文化重构**

中国史家划分的中国近代史是从 1840 年开始的，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中国中心观的历史想象，忽视了从 1500 年就已经启动的全球化进程——殖民主义势力到达中国，不过是这个进程必然的历史后果。至于是在具体的哪一年，广东海面上会出现英国海军舰队，那倒可能纯属偶然。

从国际眼光来看，近代之后的中国似乎是在不断创造一种“与众不同”的历史经验：在 19 世纪中期的世界地图上，唯一未被欧洲殖民者彻底占领的整体性的大陆地理空间是中国；在 20 世纪的冷战格局中，唯一将冷战两级同时视为对手的大国是中国（即所谓“反帝反修”是

也）；从 21 世纪初的世界格局来看，唯一在政治经济体制上不按西方经验发展且取得显著成就的国家还是中国。

这一切使得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显得非常另类，也使得中国特殊论似有成为显学的潜力。然而，从文化秩序的角度观察，不难发现，中国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的现代化历程，若以儒家文化为坐标，实际上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去儒家化”的进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主体性渐趋模糊的过程。在从“天下帝国”转变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中国一方面始终以西方为师（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另一方面，也始终承受着主体性模糊带来的各种文化压力（例如关于中西文化关系反反复复、各种形式的“体用之争”）。对西方文化标准的接受，使中国的自我想象从唯一的“天下中心”演变成一个“普通的”主权国家；文化主体性的模糊，使中国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总是找不准文化立足点，时而妄自尊大，时而崇洋媚外。但无论如何，作为唯一从古代文明延续至今的现代国家，中国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免遭“挟古希腊、罗马以令天下”的西方文明彻底摧毁，留存了一个文化大本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与经济、政治秩序相比，中国社会文化秩序的重建显得更为艰难。边疆问题只是其中一例。

今年是辛亥百年。百年之前，满洲皇权的崩溃，对蒙、藏、回疆的影响，并非“五族共和”那么简单。当“天下观”神性不再，欧式民族主义思想滥觞，彼时边疆对中央的政治离心力陡然提升。在这一点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所言不虚。正是因为共产主义理想作为普世价值的精神感召，新中国奇迹般地迅速整合边疆族群，恢复晚清疆域，重构了“大一统”格局。这时的“边疆”概念，以国家为中心，叙述的重点，不在内部，而在外部，民族主义意识聚焦于中华民族，即一体化的国族身上。

改革开放之后，这种现代语境下的“大一统”格局受到侵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哲学背景。西学再次东渐，中国人开始重新纠结于“民族”、“少数民族”、“边疆”这些本已内涵固化的概念，其原因在于，关于这些概念曾经构建起来的社会共识，在社会环境与社会意识的变迁之中渐渐缺失了。

20 世纪下半叶由国家主导的民族分类，实际上是一种二元结构，即关于“汉”与“非汉”（少数民族）群体标签的制度性符号分配。与此同时，边疆地区，即使是“汉”在当地占人口多数的边疆地区，也多被插上“民族地区”的标签，凸显出与国家中心地带的文化差异。这种分类方法，其初衷原是为了提升少数群体的政治与社会地位，落实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平等原则，却因为秉承斯大林的思想遗产，在知识理解上过于强调“群体”单位的客观实在性，人为地将原本动态、流变、情境化及可以由社会成员工具性建构与利用的族群边界，凝固在国家政策的制度安排之中。同时，民族主义知识逻辑与社会意识的滥觞，不仅强化了少数族群的群体归属选择，也使国族（中华民族）构建基于某种民族主义式的价值立场。而社会意识的主流，也几乎不见可以超越民族主义（无论是公民的还是族群的）的更高、更宽容、也更具普遍意义的价值体系。

在只见群体不见个体、只见边界不见共生关系的民族想象中，无论是主流群体还是次群体的文化诉求，都可能在一种民族主义式的知识叙述中发生变形与失真，而国家，也可能成为某

种束缚在自身构建的民族主义知识困局中难以挣脱的思想囚徒。“边疆”，本来被叙述为主流对于边缘的关怀，多数对于少数的支援，但在后现代的知识语境中，则也可能代表着某种歧视性的文化立场，以及以主位替代客位的强制与专制。

**边疆隐喻中的权力与权利**

在现代条件下，社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和谐的体系，其基础不仅包括经济上的社会分工，更包含基于价值共识之上的文化秩序。

在这一点上，基础性共识在于：文化是人的权利，既是个体，也是群体的权利。对文化差异的尊重，在本质上是对人的尊重。同时，构建文化秩序是国家的权力，任何国家都必须建立在某种公民共享的文化一致性的基础之上。

然而，二者之间存在张力。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哲学视野里，文化差异被认为是美好的、正当的、蕴涵着丰富智慧与经验的宝藏；但在国家主义的政治考虑之中，对多样性的过度强调，则可能意味着社会分裂与族群冲突的可能性。

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多族群国家来说，如何能够更好地兼容多元与一体，更好地协调边疆与中心，都是一个战略性挑战。就西方国家的经验而言，从殖民主义时期的种族歧视，到后来的同化主义，从 1970 年代多元文化主义兴起再到最近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思与批评，其政治哲学与制度实践一直在发生转变和调整。经历了这个不断探索与修正的过程之后，今日的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没有经济结构和文化意义上的“边疆”，而只有国家之间的政治边界线。显然，国家内部更为均衡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共享价值观的传播，都是在文化上消除“边疆”的重要基础。

然而，西方经验绝非“完美”，其社会内部也始终存在难解的重重矛盾与激辩的思想争论。例如，仅仅一年之前，我们还听不到来自西方国家政府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正式批评。但就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萨科齐到英国首相卡梅伦，这些西方首脑亲口承认“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失败”的声音不绝于耳。其言说的角度，也都是已逝的亨廷顿在其著作《我们是谁》（2005）中曾经表达过的忧虑：多元文化主义对国家认同构成挑战与伤害。

实际上，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如果说西方社会更多地着眼于从内部文化秩序上求解如何面对认同差异，那么中国则还没有这个条件。中国仍需要处理许多现实而棘手的结构性问题，如区域发展的不均衡、转型期的社会焦虑、法治建设以及国际地缘政治竞争等等。总之，我们不仅是在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历史、文化与制度安排的基础之上求解不同的问题，而且和西方社会一样，也正在应对由全球化、经济发展、网络社会崛起、民族国家建设遭遇危机等因素带来的复杂而不确定的社会与文化后果。同时，与西方社会相比，我们不仅缺乏成熟的公民社会所能提供的相对理性化的社会博弈机制，也受制于西方知识霸权对我们思想与想象力的制约。



显然，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此刻也许我们唯一可以断言的是，用任何民族主义式的知识逻辑去处理“民族问题”，都将劳而无功。处理边疆问题的核心，不仅是要维护国家主权，也是要构建社会的文化秩序。这种文化秩序构建的原则，一方面能够促进基于公民身份的一体化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能够包容多样性的族群认同，或可借费孝通先生之论，称之为“多元一体”。

实际上，不同社会群体在文化特点与偏好上的差异，未必必然影响到一体化的社会生活。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护，经济基础是分工造成的社会职业群体间的互相需求，制度结构则是补偿性法律体系及其执行，而感召、凝聚人心的力量则来自包含道德、伦理在内的文化秩序。这种秩序植根于一些最基本的人文价值，如科学求真、政治求善、艺术求美的法则。因此，解决边疆与族群问题的密码，或在边疆与族群之外。显然，一个美好的社会，是“边疆”不再具有区分人群的意义，而回归到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

（关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关注民族问题。原文链接：http://my1510.cn/article.php?id=70470 ）

【返回目录】

# 8-4 刘晓原：中国国家形态转型的边疆之维

**“一个共同主题贯穿了清末、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这就是中央政权的整合意图与强调自身特殊性的边疆民族之间的抗衡。”**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国家形态经历的不仅仅是治乱循环和国土增削，而是完成了重大的领土属性转型。这一转型和边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世界领先国家的行列里，中国的边疆状态即使不是一枝独秀，也颇显与众不同。

二十世纪西方内陆亚洲研究的开拓者欧文.拉铁摩尔曾把古代中国称为“边疆国家”。他认为古代中国具有鲜明的边疆特征：“或者是建立于边疆或边疆以外的王朝向内运动以实现对中国的控制，或者是建立于中国的王朝向外运动以实现对边疆甚至更远地区的控制”。[1]因此，古代中国的内陆边疆一直是一种“民族政治边疆”，是汉族与非汉族国家或人民之间交往或隔离、控制或抵抗、同化或离异、战争或和平的舞台。在世界历史中近代“边疆国家”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国。立国之后，美国的发展就没有脱离其不断向西扩展的边疆。1890 年，美国最后一块领地俄克拉荷马完成了向州的转化，美国人口调查局因此宣布了美国边疆状态的终结。

在有关国家现代化的讨论中，表达经济发展水平的概念有“发展中国家”和与其相对应的“发达国家”，表达政治发展进程的有“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这些概念被广泛地应用于世界上现有的“民族国家”实体。“民族国家”形态对于欧美国家来说早已是理所当然，甚至被认为是已经过时了。但是这种形态在非西方地区的发生和发展远未得到现代政治学的重视。现有的关于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的理论多是依据西方国家的成长经验。而非西方国家的国家形态现代化暨领土属性转型的过程远未成为历史，亟待研究。本文试用“边疆国家”和“整合国家”这对概念来表述中国领土属性的现代化进程，以就教于识者。

**边疆在古代中国是个模糊概念**

“边疆国家”比较易于理解。“整合国家”是相对而言，大致会具备以下特征：(一)国家疆界基本定型，不存在涉及异向群体的国土或领地问题;(二)全国范围内人员、物资的流通基本流畅，绝少交通、通讯的死角;(三)全国经济、文化生活浑然一体，在不同地区的种种地方特征继续存在的同时，没有“内地”社会与“边疆”社会之间的隔阂，全国各地区经济、文化生活的共性远远大于相互间的差别;(四)全国政治生活万变不离其宗，主要表现在各种基于族群、阶级、性别、年龄、种族、宗教的弱势群体的政治意向和文化价值取向不是对主流社会的分离而是参与，反之，主流社会对此不是排斥而是包容。换言之，无论是在横向的地域意义上还是在纵深的社会意义上，整合国家都堪称合而一。中国显然还不具备这些特征，历史久远的“边疆”仍在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时时彰显出来。






古代中华帝国的边疆是模糊、开放和在地域上经常变动的。当中国处在一个稳定强大的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时，其实际控制的领土和间接势力所及便会扩展，中国统治者基于“天下”观念对王朝势力范围的想象，也因此变得广袤无垠。相反，当中央王朝衰落时，来自内陆草原的游牧民族便有机会压缩、渗透、乃至于征服中国王朝的疆域。中国古代政治家们早就意识到了这个现象。十二世纪南宋宰相李纲就有诗曰：“中原夷狄相衰盛，圣哲从来只自强”。[2]沿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发生的这种极不稳定的古代国际关系，使得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就如一个随季节变化而伸缩不定的湖泊，尽管有时候这种“疆域季节”会持续几个世纪之久。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人对国家所具有的领土属性也早有概念。但是在近代以前，中国鲜有对国家领土的形状与大小的执著观念。中国古人常用“山河”来比喻故土，用“金瓯”来传达领土完整这个虽能抽象表达但难以精确界定的观念。与作为文化观和意识形态的“天下”观念不同，这些概念被用于对具体疆域的描述。破碎的“山河”或残缺的“金瓯”往往同纷乱的“天下”同在。在古代，如果把中华帝国的疆域范围限定为一个具体的形状或大小，既有违“天下”观，也有违事实，因为存在于中央王朝与周边邻国之间的边疆是经常移动的。因此，古代东亚的国际政治并没有遗留给我们一幅可以度量的“山河”图景。古代中华帝国只呈现出地缘景观，而不具备地缘形体。

清代，满族统治者以内亚边疆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清王朝构建的庞大帝国不但在观念上打破了夷夏之防，而且在对帝国边疆的治理上也超越了以前历代。尤其是到了 18 世纪后期，有鉴于来自北方的沙俄帝国的挤压和西方列强从西南、东南方向对中国的觊觎，清政府开始注重对帝国边境的严格管理。但是清帝国毕竟是东亚传统国际关系文化的产物。在 19 世纪前半叶，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如魏源、徐继畲，在描绘中国疆域的时候，仍要面对无可避免的模糊性。魏源在其名著《海国图志》中称中国位于亚洲的东南，南北“径六千里，东西大抵略同”。在《圣武纪》中，魏源更明确地指出，“十七行省及东三省地为中国。自中国而西回部,而南卫藏，而东朝鲜，而北鄂[俄]罗斯，其民皆土著之人，其国皆城郭之国”;蒙古、回部、西藏、俄罗斯、朝鲜、缅甸、安南等同为中国外藩。徐继畲的中国地域观与魏源有所不同，认为除了俄罗斯、日本、印度以及在遥远西部的一些穆斯林部落以外，整个亚洲尽属中国“幅员”。[3]在这个时期，中国和西方的观察者都很难确定中国的边疆究竟是介于魏源的“中国”与“外藩”之间，还是介于徐继畲的更大的“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西方地图的绘制者通常采用的做法是把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包括在“中华帝国”的范围内，同时用一条界线把它们与所谓中国本部分开。因此，海棠叶形的中国地图首先出自西方人之手，表达的是清帝国的统治疆域。[4]

十九世纪既是一个东方仓皇应对西方挑战而饱受挫折的时期，也是一个中华帝国企图适应欧美民族国家的游戏规则而追之不及的一个世纪。在此期间，西方列强和新兴日本用战争加外交的手段对清帝国的主权和政治地缘重新加以界定，清政府在朝鲜、缅甸、越南等朝贡国相继失去原有的上国地位。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姗姗来迟地力图对清帝国原先的所谓“虚边”追加有效的控制，用移民、开发、建省等手段拢紧内陆边疆。[5]结果是，当二十世纪来临时，清朝政府与列强签署了十几个涉及领土的条约，这些条约使中国的边疆之谜至少在纸面上有了答案。在晚清的最后十年，中国出版的地图已大致与西方制作的中国地图看齐，描绘出海棠叶形状的中国领土主权范围。[6]在这个图景里，一条国际边界线把中国的内陆边疆地区圈画于中



国版图之内。这些中国地图表明，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的领土属性已开始具有“民族国家”的某些重要特质。拉铁摩尔所描述的拉锯边疆时代似乎就要结束了。

**近代中国领土属性的艰难转型**

中国领土属性近代转型的难点在于，中华“民族国家”直接脱胎于清代的多族帝国。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一度倡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辛亥革命以后却转而宣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7]这种转变表明了 20 世纪中国革命中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整合意识。然而，20 世纪历史表明，中国向现代整合国家的发展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首先，满清帝国是在各族服膺于朝廷的前提下，以“五族共存”为基础的相对松散的帝国体制。将其整合为以汉族为主导的“五族共和”，改造成消除内部民族壁垒的严密的“民族国家”，不能不引发边疆各族的反弹。其次，以孙中山为奠基人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虽然能够超越古老的华夷之辨，追求建立一个多元的“中华民族”，但毕竟是源于和局限于汉族革命的国家、民族观。毫无疑问，孙中山的同代人美国总统威尔逊和俄共领袖列宁提出的带有普世意义的“民族自决”原则，对于中国边疆民族的感召力远远超过三民主义。再次，中国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整合，发轫于帝国主义时代，中国边疆民族的内向或分离都会受到中国的整个国际环境和环伺于中国周边的列强的政策的影响。

与中国历代王朝“家天下”的传统针锋相对，孙中山倡导“天下为公”，希望走向社会的纵向整合。到 1949 年为止，孙中山及其继任者们从理念上对清王朝遗留的版图赋予“民族国家”领土的意义，但在实际上并没能完成“把民族的紧窄外皮拉扯到帝国的巨大躯体之上”。[8]“天下为公”在同边疆民族的横向联系上成为一句空话。通过宣称民族统一和用国内立法的方式界定疆域范围，是孙中山等民国领袖在中国历史上的首创。此举在宣布对清代版图继承的同时，确定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态。然而，国民党对中华“民族国家”的表述没有克服以汉族为尊的偏狭。在中国的王朝历史中，无论中国是统一帝国的禁脔还是分立的多国争斗的舞台，存在于汉族与非汉族政权之间的边疆分野曾随着双方实力的变化而移动。这种情形与包容一切的“天下”观并行不悖。中华民国伊始，中国民族主义的政治话语将历史遗留的民族分野内政化，把满清帝国疆界直接翻译为包含汉、满、蒙、回、藏的中华“国族”的地缘形体。然而在实际上，纵观民国时期，中国政府既不能克服西藏和外蒙古的实际分离，也不能有效地应付外国势力对内蒙古、满洲、新疆等地的图谋和这些地方的民族自治运动。[9]

比之于中国民族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政治渊源略有不同。马克思主义主张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民族问题就必然会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被超民族、超国界的阶级问题所代替。在创始阶段，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信奉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倡导蒙古、西藏与新疆等地的边疆人民实行“民族自决”。然而，随着共产党人在长征中对民族地区的深入，以及随后抗战中和国民党的联合，其民族政策出现了极大变化。抗战期间，中共在继续保持自己独特政治话语的同时，已不再质疑国民党对于中华民族的两个基本定义，即中华民族的民族构成必须包括内陆边疆的满、蒙、回、藏等族，中国的领土就是脱胎于前清帝国的海棠叶形的领土范围。[10]

对中国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中国地缘形体定型的关键时期。在战争的最后时刻，国民党政府认可了苏联支持下的外蒙独立，从而使中国版图从海棠叶变成了所谓雄鸡状。另一方面，中国的最大收获是在美英等国的外交支持下，光复了甲午战争后日本强占的领土。抗日战争的结束也将国共斗争推向决胜阶段，其结局必然是统一的中央政权在中国的重新确立。无论哪一党胜出，必然要开始经营尚处于游离状态的边疆地区。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标志着围绕中国边疆的新的一轮斗争的开始。

虽然此时国共两党对于中国的地缘形体和民族构成已达成共识，由于中国内陆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地缘政治位置，国共在内战中孰胜孰败，将会决定不同边疆的政治走向。内蒙古和新疆在地理上靠近苏联和外蒙古，也是中共在危难时期向苏联靠拢的必经之路。抗战期间和战后，在这两个地区先后发生了意识形态左倾、要求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分离的强大的民族运动。西藏则是背靠英印，前据青、川，顽固保守的政教上层以隔绝西藏与现代世界的外部联系为己任。中共在西藏的影响甚微;国民党政府则通过其在拉萨的驻藏办事处，保持着与西藏上层藕断丝连的关系。战时迁川后，国民党当局更视西藏为后方，积极规划用对英美外交和对拉萨的笼络取消西藏的“特殊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民党在内战中胜出，将可以继续对西藏实行怀柔拉拢;但在北方，国民党则须面对内蒙、新疆左派分离运动的抗拒和苏联浑水摸鱼的危局。如果共产党胜，则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整合新疆的“三区革命”和内蒙的“东蒙自治运动”;而拉萨则可能会向新近独立的印度和西方国家求援。

这种情形表明，此时的中国国家形态发展依然面临着在孙中山的“民族整合”和威尔逊-列宁的“民族自决”之间的抉择：中国的执政党或者借国内战争的余威收拾边疆残局，重建中华大一统;或者正视边疆民族的政治诉求，重新规划中华民族的多民族构成。前者体现的是中央政权行使主权的合法性，后者反映的是民权政治体现民意的正当性。二者皆为现代国际政治的主流理念，在中国的复杂情况下却处于矛盾之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以创建革命国家的姿态，对内陆边疆民族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政策。

**从边疆国家走向整合国家**

在重整江山的过程中，产生于内战期间的内蒙古自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容忍一个边疆民族在某种程度上的特殊化，反而可以促进它与中国内地的同质化。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重大国策写入“共同纲领”。在后来的年月里，中共领袖多次从各种角度说明，为什么在 1949 年对中国民族关系和中国民族政治体制做出决策时，没有遵循列宁的民族自决原则。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被作为一个主要原因。[11]这种论点实际上与康、梁改革派主张的清帝国内各族应在西方列强压迫的危局下同舟共济、以及孙中山的国家统合论一脉相承。1949 年决策的根源在于晚清开始的中国领土属性转型和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华“民族国家”对清王朝领土遗产的继承，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冷战国际政治。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经验来说，长征的经历和内蒙古、新疆的分离运动都表明，实行民族自决的后果将会导致清代以来形成的中国政治地缘体系的分崩离析。而区域自治的模式则可以有限地顺应边疆民族的政治诉求，同时满足现代中国主权的两个基本要求：在国际范围内，区域自治表明边疆地区处于中国版图之内;在国内，它规定边疆民族自治政府处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12]

实施民族自决原则的结局无论是分离还是统一，其核心内容是有关民族政治集团之间地位的对等和对弱势民族政治诉求的认可。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质则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国家的政治意志，其次才是对地方主体民族的某些特殊利益的包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区域自治的效果明显优于晚清和民国时期在边疆“建省”的方针，表现在对边疆分离主义安抚的同时达到促进政治同质化的效果。这种效果在新疆和内蒙古尤为显著，区域自治的实行似乎标志着清代与民国时期省制向这些地区扩张的退潮。而在清代“毋庸代为经理”和民国时期中央政令向未达到的西藏，区域自治则意味着中央权威的推进。在一段时间里，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的特殊状态相当容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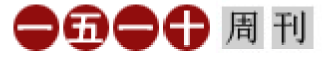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的设想是在十个省份实行不同行政层次的区域自治。最终结果是不同级别的民族区域自治在覆盖国土面积近 65%的二十个省区得到实行，没有民族区域自治的省份反而成为少数。[13]1956 年底，新华社宣称区域自治已在几乎所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起来。随后，当时的国家民委主任乌兰夫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宣称：“我党已经胜利地解决了国内的民族问题”。[14]

中国政府在 1950 年代中期所宣称的区域自治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但边疆民族问题还遗留了尚待解决的三重隐患。首先，清代遗留的内陆边疆民族问题具有历史、文化、地缘方面的特殊性，与在中国内地省份聚居的少数民族大不相同。这个特殊问题并不会因为边疆民族和内地诸民族同被视为“少数民族”而消失。第二，中国的区域自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所谓胜利表明的是中央对边疆分离倾向的抑制，并没有彻底消除民族冲突的隐患。[15]最后，从一开始就为边疆地区预制了“解放”、“自治”、“社会主义革命”的三部曲，区域自治的实施仅预示着第三步的到来，即以“社会主义”的方式使边疆与内地最后实现同质化。因此，五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以包容边疆特殊状态为前提的合作，亦即边疆民族接受区域自治的基础，注定要改变。当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在中国内地搞得天翻地覆的时候，边疆地区的民族政治关系也随之激化，与全国一起处于整而不合的状态。

众所周知，与西藏的政教统治集团和新疆各族相比，内蒙古民族从 20 世纪初就直接参与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以前，内蒙古民族是第一个加入到中共革命行列中的边疆民族。内蒙民族在新中国的利益所在，再加上内蒙古区域自治模式对人民共和国体制的贡献，都使得 1949 年后的内蒙古实际上已不再是政治意义上的“边疆”，而在最大程度上完成了与内地的政治同质化。

可是在文革时期内蒙古边疆民族政治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再次开盘。文革开始时乌兰夫成为最早被罢免的省级第一把手之一。他的罪名是民族分裂，罪证之一是在 60 年代重发由毛泽东亲署的中共在 1935 年给内蒙民族的一封公开信，该文件把内蒙古视为一个“民族”，并称“民族是至尊的，各民族是平等的”。[16]

毛泽东以后，用革命的方式整合边疆民族的时代在中国结束了。“民族问题”得以摆脱“阶级斗争”的幽灵，重新进入中国的政治日程。中国的边疆民族政策一度显示出改革的气象。





以东南“经济特区”为先导的经济改革最终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了惊人变化。而西南“民族特区”却半途夭折。中国改革伊始，邓小平把“小康”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期目标。同时，他对中国“没有大规模的民族冲突”的状况表示满意。这或许可以被称之为中国边疆的“小治”。[17]这些目标对一个刚从文革灾难中恢复的国家来说是现实的。在中国改革进行了三十多年以后，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愈益举足轻重，这些目标就显得过时了。在最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发生以前，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持续增长率使世界叹为观止。然而，在中国稳步向“发达国家”的目标迈进的同时，距“整合国家”依然遥远。区域自治加经济现代化的二元公式并没有化解边疆地区的民族冲突。中国的有关研究发现，在过去几十年里“政治动乱”、“反革命武装叛乱”和“恐怖活动”在新疆发生的频率与 1950 年代、1960 年代没有差别。近年来在新疆和西藏发生的恶性事件表明，在全球化和信息数字化的时代，发生在边疆的族群冲突会迅即波及全国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响。[18]

综上所述，欧文.拉铁摩尔对古代中国是一个“边疆国家”的断语在二十一世纪仍然有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边界以内，古老的边疆民族政治仍以新的形式得以延续。一个共同主题贯穿了清末、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这就是中央政权的整合意图与强调自身特殊性的边疆民族之间的抗衡。迄今为止，民族国家的框架成功地把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圈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但一个能将中国内地和民族边疆的自发能动力导向同一方向的共同的伦理心态尚待形成。从内政角度来说，“边疆”与“内地”的差异表明中国社会、民族构成上的断层。从外交角度来说，“边疆”状态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软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年过甲子，中国的边疆状态不但依然存在，而且经常以严重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如果相信人类活动是趋同的，历史发展是线性的，那么美国在立国后历经近 120 年才结束自己边疆状态的例子，或许预示着国龄刚过甲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会走出自己的边疆状态。但是，如果拉铁摩尔所揭示的“边疆国家”是中国亘古不变的文化基因，那么只有高度的政治智慧才能使中国的永久边疆长治久安。

[1]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Boston: Beacon Press, 1940), 409.

[2]王启兴，张虹选注：《中国历代爱国主义诗词精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3 页。

[3] 魏源：《海国图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1 页;魏源：《圣武记》，世界书局 1936 年版，第 63, 72, 123-134, 135-158, 163-191 页;徐继畬：《瀛环志略》，上海：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4 页。有趣的是尽管两人都称满洲为东三省，满洲建省到二十世纪初期才发生。



[4] 这种绘制亚洲地图的方式可参见

The London Atlas of Universal Geography (London: J. Arrowsmith, 1832),

Colton's Atlas Of The World, Illustrating Physical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J.H. Colton and Co., 1856),

Allgemeiner Hand-Atlas der Erde und des Himmels nach den besten astronomischen Bestimmungen, neuesten Entdeckungen und kritischen Untersuchungen entworfen (Weimar: Geographisches Institut in Weimar, 1856),

Letts's Popular Atlas (London: Letts, Son & Co. Limited, 1883), and The Times Atlas (London: Cassell & Co., 1895).

[5] 十九世纪与中国边疆有关的国际条约可参见储德馨等：《中外约章会要》，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6] 《大清帝国全图》，上海：商务印书馆 1905 年版和《皇朝置省地图》，武昌：雅心地协会 1903 年版中的两幅新式清帝国全图被收入 China in Ancient and Modern Maps (London: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Limited, 1998), 261, 267。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24-330 页，认为晚清地图学者邹代钧在 1903 年出版的《中外舆地全图》对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地图学有极大影响。

[7] 王启兴，张虹前引书，第 317 页，第 312 页。顾颉刚，施念海前引书，第 203-207 页。《临时大总统孙文宣言书 1912 年 1 月 1 日》，张羽新与张双新主编的《民国藏史史料汇编》，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 卷，第 31 页。《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 年 3 月 11 日公布》，同上，第 1 卷，第 42 页。






[8]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y (London: Verso,1991),86。

[9]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民族边疆问题，可参见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Armonk: M.E. Sharpe, 1990);

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David D. Wang, Under the Soviet Shadow: The Yining Inciden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9);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Lin Hsiao-ting,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6);

Christopher P. Atwood, Young Mongols and Vigilantes in Inner Mongolia’s Interregnum Decades, 1911-1931 (Leiden: E.J. Brill, 2002);

Baabar, Twentieth Century Mongolia (Cambridge: The White Horse Press, 1999);

Xiaoyuan Liu, Reins of Liberation: An Entangled History of Mongolian Autonomy, Chinese Territoriality, and Great Power Hegemony, 1911-1950 (Stanford and Washington D.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6).

[10]《中央关于反帝斗争中我们工作的错误与缺点的决议，1931 年 12 月 2 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 卷，第 53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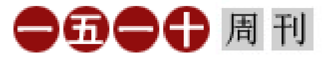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1935 年 12 月 25 日》，同上，第 10 卷，第 609-617 页。

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 年 3 月 4 日》，同上，第 11 卷，第 801-818 页。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 年 10 月 12 日至 14 日》，同上,第 11 卷，第 557-662 页。

《国民党与民族主义》，1943 年 9 月 18 日《解放日报》社论，同上，第 14 卷，第 566-576 页。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 年 12 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








文献汇编，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25-632 页。

董必武：《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1937 年 6 月 14 日》，同上，第 538-541 页。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1943 年 8 月 16 日》，同上,第 723-727 页。

[11] 《中共中央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给二野前委的指示，1949 年 10 月 5 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卷，第 24 页。

《周恩来在中央民委举办的西藏干部研究班上的报告(节录)，1950 年 4 月 27 日》，西藏自治区党史办公室编：《周恩来与西藏》，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2 页。

周恩来：《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1957 年 3 月 25 日》，同前，第 155-164 页。

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1957 年 8 月 4 日》，同前,第 165-187 页。

1958 年 3 月 10 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的内容转引自罗广武：《新中国民族工作大事概览，1949-1999》，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95-296 页。李维汉：《民族工作中的几个问题，1961 年 9 月》，《李维汉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66-372 页。

[12] 1952 年 8 月 8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明确规定“各民族自治区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见罗广武，前引书，第 79-82 页。

[13]毛泽东：《关于区域自治问题的批语，1950 年 9 月 16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 卷，第 518 页。

晓根：《中国少数民族行政制度》，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74-475 页。又见“中国政府网”，检索“国家制度”以内“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的“中国民族自治地方”。

[14]罗广武,前引书，第 222-223 页。乌兰夫：《党胜利地解决了国内民族问题，1956 年 9 月 19 日》，《乌兰夫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上册，第 408-418 页。

[15]在 1945 年至 1947 年间，乌兰夫在将内蒙古自治运动纳入中共轨道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回顾有关经历时，他对东蒙自治运动唯一有正面意义的评论是它使中共得以同一个统一的运动谈判，而不是解决各个分散的政治组织。

见刘介愚：《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必由之路》，《内蒙古文史资料》第 50 辑：《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前后》，呼和浩特：内蒙古政协文史书店 1997 年版，第 216-235 页。



［17］邓小平：《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1979 年 6 月 15 日—1990 年 9 月 15 日》，《西藏工作文献选编》，第 298-299 页。

［18］马大正，前引书，第 30-136 页。厉声，前引书，第 330-377 页。江泽民：《促进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2001 年 6 月 25 日》，《西藏工作文献选编》，第 547-560 页。

胡锦涛：《抓住有利时机，推动西藏跨越式发展，2002 年 3 月 5 日》，同前,第 612-616 页。

（刘晓原，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哈佛费正清中心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边疆史和国际冷战史的研究。原文发表于《文化纵横》2011 年 12 月刊。原文链接：http://my1510.cn/article.php?id=70119 ）

【返回目录】



# 8-5 施展：边疆、帝国与现代性

**“边疆地区的官民矛盾被转化为民族矛盾，虚拟的共同体变为现实的政治诉求。斯大林民族理论内蕴的困境，构成了我们今天所遭遇的问题之来源。”**



对于大国而言，边疆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其根源在于，国家疆域较大，则内部在次区域上的多样性便是必然的事实。对于一个统一的政治体而言，如何处理这种多样性，使各部分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是个重要的问题。中国是个大洲级的国家，边疆始终是中国的政治叙事与国体建构中所必须要处理的问题。在传统帝国时代，我们有着丰富的处理边疆问题的办法；但是随着时代的转换，传统手段遇到了严重的挑战，我们便循着现代性的路径重构了国体以化解边疆问题。然而实践表明，既有的努力存在很多问题，挑战仍然存在。

古典与现代的冲突始自西方，为了理解我们今天所要解决的问题，有必要回溯历史，看一下西方在这方面的经验。

## 一、边疆是一个从属于帝国的概念

边疆的存在，是帝国空间观之表达，而帝国是古典时代各种文明的基本政治体构造形式。对古人而言，其精神世界并不像现代人一样是效率导向的，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在一个堕落的凡俗世界中个体如何可能获得灵魂的拯救。政治的意义在于帮助人在得救的道路上走得更顺畅，只有证明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政治体的存在才有意义。灵魂的拯救必定要通过宗教的途径来实现，而宗教一定是具有普遍性的，所以，得救便也是一件具备普遍性的事情。在此思想背景下，古典时代有意义的政治秩序便是一种具有普遍性指向的帝国秩序，它是对一种宗教或文明的道德理想的追求与认同，也是世间唯一的正当秩序。帝国并不是一个有界的国家，相反，它就是世界，区隔出秩序与混沌。帝国的世界首要不在于其内在的认同，而在于其道德秩序性；在与内在同一性无关的道德秩序下面，可以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彼此冲突的政策、互

相差异极大的民族与宗教、迥然有别的社会结构，等等，都可以在对这样一个道德秩序的服膺下共存。现代理性下民族国家的简单理念无法统摄帝国内在的丰富性。

古典帝国作为世间唯一的秩序来源，作为文化的核心，向外流溢。在此观念之下，中心-边疆-蛮荒之分便显现出来，帝国的空间观便形成了一种等级秩序的结构。中心地区是帝国和文明的生发之地；边疆地区作为从文明向野蛮的过渡地带而存在，它不够文明，但是却已脱离了野蛮，这是文明正在向外生长的前沿；蛮荒地区则完全未沐文明之风，从伦理上来讲他们不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人”，但理念上来说终有一天他们会被帝国所教化。

边疆在这里便构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从理念上来说，它处在低于帝国核心的地位，这也是它的一种正当地位，边疆以此自居，并无受辱感；相反，边疆仰慕帝国核心区所担纲的那唯一的文明秩序，它以自己虽不位处核心却获得了帝国的某种认可而自豪。从治理角度而言，边疆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它是帝国的国运所系。帝国必须向外扩张才成其为帝国，无有边疆便无所谓帝国。“帝国长期屹立的秘密似乎是：当帝国陷入危机或衰落时，要么是边缘拯救了帝国，要么是边缘让帝国恢复活力。”[1] 可以说，核心地区为帝国提供精神性要素，边疆地区则为帝国提供物质性要素。核心地区构成帝国的灵魂，边疆地区则构成帝国的身体。历史上伟大帝国的衰颓，必定始于边疆对中央的反抗。

## 二、现代性与边疆问题的克服

现代性带来了身体对灵魂的反叛；在政治上，则表现为边疆对于中心的抗拒。这在最初由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建立表达出来。法兰西王国拒绝神圣罗马帝国对于基督教文明的唯一正统代表性，在“国家理由”（Raison d’état）理念的支撑之下，与帝国争霸多年，最终在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当中，确立了各主权政治体彼此独立、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边疆对于帝国的反抗迫使帝国第一次承认了自己的有限性、以及边疆的主体性。一旦到了这一步，则边疆便不再成其为边疆，它是一个新的中心——中心就此多元化了。

主权国家的建立不过是现代性之政治萌发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启蒙运动与近代政治哲学进一步地将臣民相对于统治者的主体性表达了出来，这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称之为“主奴关系”的辩证运动。在主人出于物质欲望而实施的压迫下，奴隶反倒率先意识到了精神独立的意义，他们对主人的反抗将带来主体性在每一个独立个体身上的实现。个体的意义与价值不再是由在上者来规定，相反，自我意识的萌发将带来自我立法，从而建立起个体充分自治的现代政治。边疆对中心的反抗于此达到极致，主权国家内部也不再有作为客体的个人了。现代政治究

---

[1] （德）赫尔弗里德·明克勒：《统治世界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阎振江、孟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年版。第 56 页。

竟为何，在不同的哲人那里有不同的叙说，此处不赘。各种现代政治理念在法国大革命这一事件中集中体现出来，爆发出现代性。

伴随着法国大革命，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叙事结构诞生了，一群被拟制为同质的人构成一个“民族”（Nation）[2]，民族当拥有自己的独立“国家”（State）。这样一种叙事结构之下，边疆不再存在了。政治世界当中原本由帝国垄断的唯一主体性，被世界上的多元主体性，或说主体性的弥散化所取代，而每一个作为主体的民族国家都是内在同质化的。在这种叙事结构下，民族独立运动兴起，民族主义构成政治世界一支极其有力的动员力量。传统帝国的内在多元、天下一统的叙事结构不再具有正当性了。

对于小国来说，内在同质性相对容易达到。但是对于大国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了，或者说是不可能达到。地理条件的差异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构、乃至人们心理结构的差异是一种现实存在。中央对于边疆地方的统治，如果不承认这种差异，在主体性泛化的时代将带来边缘的反抗；如果承认差异，则民族-国家便不是一个合适的国体形式。

对于大国来说，这是一个必须从理论上予以处理的问题——既要确保大国不被民族主义所肢解，又要充分承认过去的边疆地区的主体性——理论上的处理最终会在国体上表达出来。我们在现代历史上可以看到多种处理该一问题的努力，它们又可分为传统延续性的，通过对历史上留传下来的多元主体性做现代模式的确认来消除民族主义的张力；和现代性的，通过对于民族主义的确认以及超越，来克服民族主义所可能带来的对于帝国的消解。前者的代表是英美，后者的代表是苏联。我们可以就这几个典型来进一步加以分析。

1、大英帝国。英国在近代以来的殖民扩张中，建立了史上最为庞大的殖民帝国，在其鼎盛期，领土面积达到 3367 万平方公里，占全世界领土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也占到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女王陛下的米字旗飘扬环球四方，并随着大英帝国的舰队漫游四海，无论何时，帝国永远有一部分领土在阳光之下，号称日不落帝国。帝国内部极为多样化，完全没有任何可能用“民族国家”的理念来加以统合，帝国的统一系由帝国的君主来实现。英国女王作为帝国每一块合法领土的法人代表，直接体现每一块领土的主体性。英国本土与海外非英国政府直辖殖民地之间，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关系，女王超越于任何单块领土和人群之上构成统一的象征，大英帝国是一个通过传统君主而内在联系起来的身合国（personal union）。政治实践中，统一帝国之下的多元主体性由法人代表的唯一性与间接统治两种手段来实现。英国将现代政治包裹在传统的外衣之下，通过君主世系的传统延续性维系了帝国稳定的统一；又由于君主身份的多重性，边疆问题便被消解掉了。

对于由分散世界各地的领土构成的殖民帝国而言，大英帝国这样的身合国国体利于各块领土的统合。与其相比，共和制的法国在统合海外殖民地的时候便遇到了法理上的困难。法国总统是否海外殖民地的法人代表，这成为一个麻烦的问题。如果是，则选举权并未扩及殖民地，这个代表是如何出来的？如果不是，那么海外殖民地的居民与法兰西共和国究竟是何种法理关

[2] “民族”是现代政治学当中一个虚构出来的概念，故此文中称其为拟制的结果。这个虚构的概念是民族主义得以成为最有力的现代政治动员力量的根本所在。关于民族的虚构性，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系？法国在法理困境下，采取了一种对海外殖民地进行同化的努力，以便其民族国家叙事逻辑的内在一致。于是，殖民地上的黑人学生读的书是“我们的祖先高卢人”，这种悖谬的场景是无法长久持续的，法兰西殖民帝国最终难免解体，法国及其诸块殖民地均重构为简单的民族国家。

2、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是由移民建立起来的国家。1620 年，来自欧洲的一群清教徒，在登上北美大陆之前，在船上签订了《五月花号公约》，公约的起始部分即提到：“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彼此以庄严的面貌出现，现约定将我们全体组成公民政体，以使我们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并在我们之间创造良好的秩序。为了殖民地的公众利益，我们将根据这项契约颁布我们应当忠实遵守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法令和命令，并视需要而任命我们应当服从的行政官员。”这种自治精神构成了美国最基础的立国精神之一，以致两百多年后来访美国的托克维尔感叹乡镇自治精神对于美国人的自由的重要意义。此后，躲避旧欧洲的宗教迫害的人、渴求自由新生活的人、以及各种冒险家，陆陆续续来到了北美新大陆。人口的膨胀并未构成什么问题，因为早期的十几块殖民地以西有着大片的空地等着被开发，于是一场浩大的西进运动在美国独立之际即已开始，持续了逾百年直到 19 世纪末。

1893 年，美国史学家特纳于《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边疆假说：“直到现在为止，一部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对于大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定居的向西推进，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在美国的历史上，边疆并不像在帝国的统治之下作为文明的流溢处，相反，它是文明的前线，是美国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的拓展。新辟边疆也必定是通过乡镇自治的方式最先完成建政，具备充分的主体性。条件成熟时，它便以一个新的邦/州（State）的身份加入合众国。美国的合众国国体具有充分的扩展性，使其可以没有法理障碍地从 13 个州扩展到 50 个州，最后终成疆域辽阔的大国，其内在的多元主体性由地方的乡镇自治与上层的联邦体制来实现。这从一个角度证明了美国国父之一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说法，共和政体将能扩展到更多数量的公民和更为辽阔的疆土；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乡镇自治实系最初的移民从英格兰带来的传统，以致亨廷顿说美国将“都铎制度和大众参与统一在一个政治体系中”。[3] 美国成功地把传统包裹在现代政治的外衣下构建起来，克服了边疆问题。

3、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欧洲伴随民族主义而起的，还有社会主义运动。各社会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都在马克思主义，它试图用更强的现代性来克服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个体主体性的普遍化伸张是其重要承诺，民族主义便要在此种框架下获得处理。1917 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掌握了政权，继承了沙皇遗留下来的庞大帝国。沙皇俄国的疆域横跨欧亚大陆，内部地理差异极大，治下人口的种族、信仰、生活方式等等亦千差万别，沙皇通过设置诸多边疆总督区的方式来实现统治。随着革命的实现，布尔什维克政党必须践行自己的允诺，帮助弱小民族独立建国，这种主张可以在道义上占据制高点，并由此打击俄国的敌人。可这对俄国也构成一个巨大挑战，因为这意味着沙皇留下的大量边疆地区将要脱离而去，新生的布尔什维克国家将要因此面临极其不利的地缘格局。然而若不同意边疆地区脱离而去，则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主张又难以自洽。

---

[3]（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 年版。120 页。

为克服这个内在矛盾，斯大林在列宁的民族主张的基础之上，发展起一套新的民族理论。该理论首先将民族用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历史文化这几条界定出来，区别于旧有的主要强调文化特性等心理因素的民族主义理论，将民族框定在特定的土地之上，并视其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一种特有现象。斯大林主张如此划定出来的各民族都应当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是应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而无产阶级本身是个超国界的概念，其根本利益在于实现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所以它们领导的国家应当结为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样，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具有自身的主体性，但是在对一个更大的事业的参与当中，又可以实现一个普遍帝国的架构。这个普遍帝国的领导者是布尔什维克政党，其基础是本性上超国家的无产阶级，所以政党是不存在民族性的，是唯一的。从而，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种中央集权的政体，实现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样一个国体的统一，并且该国体还具有充分的扩展性，其终极指向全世界的统一。保加利亚等国便曾提出过加入联盟的主张。民族主义问题在斯大林民族理论的辗转腾挪之下，被吸收乃至超越，用更强的现代性克服了现代性所带来的边疆问题。

美苏两国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们的国体是包容着内部多样性、又具有高度凝聚力的体系，或可称之为现代模式的帝国。与英法那种领土不相连的海外殖民帝国相比，对美苏这样的领土统一的帝国而言，君主制与民主选举制，在统合上的难度区别并不大。所以，沙皇的退位未曾带来帝国的解体。后来苏联的解体，其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种政体结构，各加盟共和国成立自己的政党，这就丧失了将联盟统一起来的那张超越民族之分的大网。也就是说，不采行无产阶级专政，则斯大林模式的边疆处理模式会带来解体；但是采行无产阶级专政，则意味着国家的低效率，这也是戈氏改革的动因之一。这种内在的困境是后来者不可不察的。

## 三、中国的边疆问题

中国最早的地理志《尚书·禹贡》彰明了中央-边疆-蛮荒的帝国空间观。《禹贡》在结尾处叙述了天下治平之后的“五服”秩序原则。去王都五百里，是一种渐行渐驰的直辖模式；去王都一千里，则是封邦而立；去王都一千五百里，尚可文武绥靖；去王都两千里及更远，则皆属蛮夷之辈，概处羁縻。此处的里数并不简单地是个数字游戏，其直接指向一种文明的高下秩序，由王都向外辐射，形成一种渐有落差的文明等高线，中华、蛮夷由此而分。历史上的汉人王朝从未真正统治过草原游牧地区，因为长城内外的自然生态、生活方式都有着根本不同，关内的治理模式放到关外是不管用的。于是，皇帝无法直接治理的塞外地区在蛮夷、羁縻之叙事结构下，获得其被定义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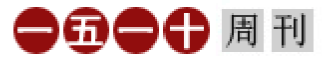
最后一个帝制朝代大清，真正地同时统治了长城内外的草原和汉地。1635 年皇太极征服察哈尔汗，获得大元传国玉玺，袭蒙古大汗位，并于 1636 年称帝，满蒙联盟就此形成；1644 年清军入关征服了中原，从此长城内外皆由满清皇帝统治。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二元帝国体制，内地十八行省与塞外诸地是大不相同的治理结构，两片广大疆域以对于满清皇帝的共同效忠而结

合在一起。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类拟于大英帝国的身合国。针对汉人视满蒙为蛮夷禽兽之拒斥心理，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辩说道：“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而喀等，尊君亲上，慎守法度，盗贼不兴，命案罕见，无奸伪盗诈之习，有熙皞宁静之风。此安得以禽兽目之乎！若夫本朝，自关外创业以来，存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即古昔之贤君令主，亦罕能与我朝伦比。且自入中国，已八十余年。敷猷布教，礼乐昌明，政事文学之盛，灿然备举，而犹得谓为异类禽兽乎！”由于皇帝的双重身份，素赖羁縻的边疆获得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主体地位。二元帝国的存在为后来的五族共和之大疆域国家提供了一个基础。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这随即提出一个严重的问题，没有了皇帝，蒙藏等地仍与汉地合为一国的法理依据何在？该依据在《清帝逊位诏书》当中表达了出来：“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于是，二元帝国在国体转换中一变而为统一的共和国体，中国开始了向现代性的转型。嗣后战乱扰攘，国事难定于一尊，民国先后公布了多部宪法，其总纲中屡屡提及中华民国领土为各省及蒙古西藏，各地方实行自治云云。然而由于国家没有实现真正统一，边疆问题的制度性落实始终无法有效展开。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的现代性以另一种形态展开。对于边疆问题，中国学习苏联模式，依照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开始了民族识别工作，力图将边疆问题化作民族问题加以处理。于是，在中国内部识别出 56 个民族，但我们并未像苏联一样将其建立为加盟共和国的形式，而是用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来体现少数民族的主体性；国家的统一性则是由无产阶级专政体现。不考虑民国阶段三十几年政策未定之阶段的话，可说中国从类似于英国的模式，直接转入了类似于苏联的模式。但是，前文曾经提及，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模式意味着国家效率的低下。所以，1978 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逐渐弱化了，但政策的这一调整却在国体构造、政治治理方面都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该诸挑战系由中国借用外来政治理念构建现行国体所带来的内在不一致所致，这首先涉及到的就是我们对于“民族”理念的理解。我们通常把 nation 这个词译作“民族”，它并不是个真实的存在，而完全是个想象的共同体，是现代政治用来聚合国民的政治神话，具有最强的政治性涵义，其界限恰等于民族国家。另一个词 ethnic 也常被译作“民族”，它所指称的是一些原生性的具有差别的人群，其界限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民族国家。Ethnic 之差别的缘由可能各种各样，人种、宗教、地域、气候等等都会带来区分。这种差别不构成政治意义，试图在此差别上建构政治秩序的努力只会带来对国家的否定，并且也难以成功——日本在二战中所主张的黄种人对抗白种人的大东亚秩序，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皆属此类。在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引领下，我们现有的民族理念中有用建构的 nation 吸纳本属自然差别的 ethnic 之意——并且国人也逐渐对此习以为常，以其为自然之理，这实在是一种误解——这也正解释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该政策是将民族做政治化处理，如果仅仅是 ethnic，便无需自治。但是中国又没有像苏联那样把自己的国家彻底地非民族国家化，进而作为一个旨向普世主义的联盟存在，而是在“民族”之上又提出一个中华民族的理念，试图将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






（nation-state）建构起来。该种建构动用了中华“民族”这个理念，原则上来说便要求内在同质化，但是这一要求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多元政治主体性又是无法并立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些都不是太大的问题，阶级构成了超越一切的政治性；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这成为巨大的问题。用“少数民族”这样一个概念来识别中国的内陆边疆的特定人群，是带有政治性意涵的，其中包含着承认其主体性的内容——与美国在国内所识别的“少数族裔”（ethnic）大不一样，后者只有社会性意涵——这是在现代性背景之下对传统帝国视野下边疆问题的转化。但这种转化在中央-地方关系之外，又生出了更加复杂的新关系，该种复杂关系在传统帝国好处理，在现代国家则难应对。在该种政治意涵的建构下，边疆地区的官民矛盾会被转化为民族矛盾，虚拟的共同体变为现实的政治诉求。斯大林民族理论内蕴的困境，构成了我们今天所遭遇的问题之来源。

中国内部的多样性是个不可改变的现实，这意味着“民族国家”并不是我们用来构造中国国体的一个合适框架。就已有的历史经验而言，对共和制大国来说，美国的联邦模式是一种更具可持续性的国体选择。该种模式将地方的主体性确立在自治共同体上，但该共同体并非出于建构的“民族”，而是基于小区域内众人长期共同生活的心理经验，出于自发性的成长，与自我治理的诉求。这样的自治体有着对主体性的某种主张，但并不指向绝对的独立，它们又因对一种更高信念的共同信奉而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联邦制帝国。中国在历史实践中分别采取过大英帝国模式与苏联模式，但我们还可以在历史中发现一个失败了的尝试，那就是类似于美国模式的“联省自治”的努力。该尝试的失败并非因为其在理念上即不可行，而是出于战乱等其他的历史原因。重温这段历史也许会给我们新的启示。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初起之际曾提出联省自治的理念：“中国于地理上分为二十二行省，加以三大属地即蒙古、西藏、新疆是也，其面积实较全欧为大。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各随气候而为差异。似此情势，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最为相宜。每省对于内政各有其完全自由，各负其统御整理之责；但于各省上建设一中央政府，专管军事、外交、财政，则气息自联贯矣。”梁启超、胡适等许多人也支持类似主张。该理念在上世纪 20 年代初期曾进入政治实践，湖南、四川、云南、江西、两广等许多省份的实际统治者都力图推行联省自治，并纷纷颁布本省宪法。然而这些实力派对于联省自治的推崇多半是出于割据自保的念头，这与清末以来兵为将有，兵权下移的趋势有着直接关联。故而该一努力没多久便遇到了孙中山等人的反对，在国民党领导的北伐战争成功之后，中国建立了党治国家，联省自治遂无疾而终。



虽然如此，联省自治这一主张内在的政治原则还是值得我们重温的。前引中山先生的表述中提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即自治的基础在于国土广大而致各省气候、习俗不同之现状，而非在于建构出来的民族。联省自治力图重构庞大国家内部的央-地关系，在充分认可各地方之主体性的基础上，以“湘人治湘”、“川人治川”等为前提，再联合为一大联邦共和国。“湘人”、“川人”之类盖以人民生活地域而定，与族裔区分无关。如川人中可能汉满蒙回藏各族裔皆有，但由于居于共同的土地上，有着相去不远的生活习惯，便构成了实际上的共同体。在此政体结构下，边疆问题便可以转化为一个央-地问题而被吸收掉。“疆人治疆”、“蒙人治蒙”等都是正常的地方自治之表达，但“疆人”、“蒙人”等并非以族裔划分，而是以实际的生活居住地来划分。居于湖南的维人亦为湘人，而居于新疆的汉人亦为疆人。如此，则对于边疆地方主体性的承认有了基础，而少数民族也就成为少数族裔，从而消除我们所用的民族理念中所不应有的政治性意涵。在此基础上，以中华数千年之大一统的历史传承作为一个超越于各个地方的共同信念基础，联各地方为一大的政治体系，中国的国体结构便转型为一个自洽的现代政治体系，破解掉今天所面临的诸多困境。

（施展：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政治学教研室副教授。原文链接：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e3eea3737a1ebac8 ）

【返回目录】

# 【同】

## 8-6 贺卫方、梁文道：从边陲看中国

**“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没有独立之前，香港、澳门、珠三角这些城市跟南洋的关系就是这样接近，没有任何断裂，没有分割之感，我们从来不去担心我们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人，我们不被这种问题困扰，我们很自然地来来去去。”**





（编者注：本文节选自 Co-China 论坛第 12 场“从边陲看中国”讲者发言）

●贺卫方：我现在处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处境中，从 2009 年的 3 月 11 日我到了新疆石河子之后开始的。其实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没有机会对新疆有深度的了解。许多人去新疆是一种游客的心态，去了以后匆匆忙忙一个礼拜、最多两个礼拜，走一些著名的景点，增加一些谈资，拍一些照片，至于当地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没有兴趣做深入的了解，当然也没有时间去做这样的了解。

那我现在的状况不是这样子，我几乎成为一个新疆人。在《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里我说我是“新新疆人”。跟当地的人生活在一起，我许多的同事几代都是新疆人。我接触到一位石河子老居民，他们是七代新疆人、七代的石河子人，他告诉我说他们家应该算是最古老的石河子人了，石河子在 1950 年之前其实是一片荒地，就是几户人家的一个小村子。当年的兵团选择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城市，按照艾青一首诗的说法，它是中国最年轻的城。我特别高兴有机会能够去观察维吾尔族的生活。我有机会到非常边陲的地方，像红其拉甫口岸。当年的玄奘到印度取经，回来的时候走的就是这条路线：从红其拉甫口岸走到喀什，再从丝绸之路的南线回到长安。我也有机会到其它的口岸，前一段时间到过霍尔果斯口岸，还有博尔塔拉州的阿拉山口口岸，也到过位于塔城的著名的小白杨哨所。

这段时间新疆、西藏都处在多事之秋，中国的民族自治政策和相关的宪法制度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该如何设计一种更合理的制度可以使得我们这样一个超大型的所谓民族国家能



够和谐共处？中国不是欧洲意义上的 nation state，我们的情况更复杂、更多元，包括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一些纠葛也更麻烦。

新疆本地的学者，像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还有其它大学的学者都有在研究这个问题，但研究受到一些限制，比如说维吾尔族的学者在叙述他们本民族历史的时候有一些问题会变得非常敏感，像王力雄先生在《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中所展现的那样，在今天这些问题很难进行公开讨论。汉族的学者研究兵团史也很麻烦。兵团是一个极特殊的体制，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很好地去理顺这个体系。它是一个省级单位，现在只有新疆才有生产建设兵团，但新疆又是一个自治区，自治区里面有一个不属于自治区管辖的系统，这个系统有自己的检察院、法院，有自己的公安部门，有自己一整套的政府结构，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之下我们连怎么去解释自治区都会变得非常困难。

新疆的考古现在也成为一个多多少少带点政治意义的事情。我曾经去过的若羌县一个地方叫米兰，是一个小镇，它的旁边有一个历史上留下来的卫城，在这个遗址上斯坦因挖掘出来一个画在木板上的带翅膀的天使的画，这副画特别具有希腊风格，因为带着翅膀的天使这样一种构图其实只有在印（度）希（腊）文明中才产生过。还有，我们都知道楼兰女尸，楼兰女尸完全是欧罗巴血统的形象。这说明历史上南疆这样一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绿洲地带是一个多种文明融合或者说碰撞的地方，有时候会发生兵连祸结的战争，有时候会是某种程度的和平相处。

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新疆的很多研究都不可避免带有局限性，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超然的角度进行研究。而新疆以外的学者，有一些人是语言有局限，不懂维吾尔语或突厥语，如果不了解当地的语言，就没有办法很深入地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另外，许多人也根本没有兴趣研究中亚问题、新疆问题，我们的很多学者在研究方向上有太多功利色彩。

国外倒是有一些做这方面研究的人，包括美国的一些学者对维吾尔族历史有很深入的研究，还有瑞典的学者。瑞典历史上跟新疆有特殊的关联，有一位马可波罗著作的注释者说瑞典人的祖先在喀什，这个传说持续了一百年，虽然后来被证明是假的，但还是吸引了许多瑞典人到新疆，探索新疆的历史和文明，包括在那里传教。在南疆传教的，基本上是瑞典人和荷兰人。前不久，我读一本瑞典学者写的关于在南疆宣教历史的书，其中有很多喀什在二十世纪早期的历史记录，非常珍贵。但是，这种书的翻译又会出现问题，如何翻译过来又不触及敏感问题？如何让西方学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特别麻烦。我在读书的过程中就知道这书肯定没办法翻译成中文，因为它有许多东西都是在说新疆是某种独特的地方，跟中国其他地区不一样。

不管怎么说新疆历史的研究非常不容易，它的历史仿佛是丢失了很多局部的一个拼图，完全没有办法去把它拼得完整，但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研究不重要。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站在边陲遥遥相望，我们所谓的中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概念？中国不单是指一个国家，也是指一种文化，还是一个政治的概念。我们知道在英文中国家这个概念有三个词，state，country，nation，这三個词实际上是三种不同的指向，我们说 state 的时候是强调它的政治的意义，说 nation 的时候强调的是民族的意义，说 country 时则强调的是地理的意义。其实我们需要在这三

个层面上去反思中国到底是什么，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我在新疆生活特别的一种感触，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我都会继续关注和思考这个问题。

说到这里我觉得有个问题非常有趣：我写过一首诗叫《长城之用》，我很好奇古人为什么要修建长城？难道只有军事目的吗？它是不是区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一条界线？我们说长城内外是故乡，里面和外面都成了故乡，这是不是说明北方中国的血缘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查了一下我自己家族的历史，发现我姥姥是蒙古族人，而我的这个贺姓至少有一支是汉朝时从胡人的一个姓改过来的，那个姓前面的字是贺，后面还跟着一堆其他的字，我们中国人特别怕麻烦，不愿意搞得很复杂，所以就只留下前面的一个字。我到了新疆以后维族的朋友老盯着我看，说你有点像我们的人。但我就怕维族的人把我当汉族人，汉族人把我维族人，那我的处境就比较困难了。

●梁文道：刚刚贺先生谈到的中亚、新疆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玩。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聊这样一个题目呢？贺先生现在在新疆当“边塞诗人”，回看中原感觉不一样。而我在香港出生，台湾长大，最近十年又在大陆的媒体上露脸写东西，所以我对处在边陲的感觉特别强烈。什么叫边陲？香港、台湾就是一个边陲地带。我做了这么多年电视直到现在还常被人批评说普通话不好，说你们这些香港人、台湾人就是不肯学好普通话。就连广电总局都有一些禁令，比如说内地电视台不能聘用港台主持人，主持人说话不能有港台腔等等。我在凤凰卫视做节目还好，不用受广电总局的限制，但我一直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有些主持人明目张胆说东北腔是可以的，而港台腔不行呢？难道东北腔比港台腔更加像中州正韵吗？我们想象的“中州”到底是什么？

贺先生提到 country，nation，state 三个词在中文的翻译中都会出现困难，事实上在关于中国是什么，中国人是什么的讨论中我们常常把几样东西在逻辑上等同起来，或者说不是完全等同，而是一种等价的关系。我们会说中国人就等于华人，然后再等于中华文化，然后甚至等于某种中华的语文。这几样东西我们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似乎中间有一个不可切断的联系。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想请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华人是什么人？华人包不包括藏人，包不包括维吾尔人？如果我们今天从政治正确的角度讲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那藏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都是中华民族构成的一部分，他们当然都是华人。但是，请注意通常我们在讲海外华人的时候，有一些 1949 年前就已经出去的藏人或者新疆人，我们却没有把他们叫做海外华人。这是为什么？有一些汉人，比如说一些三百年前已经移民到印尼的，我们今天看到他，明明不会说中国话，我们照样说他是海外华人。但一个四十年代出去的维吾尔人，我们就不会叫他海外华人。由此可见，华人按政治正确的想象包括所有我们今天认可的各个民族，但一旦叫海外华人的时候这个字眼的内涵和它包括的范围就产生了位移。

这样的变化体现在南洋上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经验。我们今天讲南洋华人，基本上全都是指汉人，但其实南洋也有一些新疆人，但是大家都不会主动把他们邀请过来，说你们也是南洋华人。我们讲南洋华人就是汉人，但这批汉人也会为我们今天所认知的中国和中国人带来很大的挑战。举个例子，我有一个新加坡的朋友去年到中国旅行，他在北京坐出租车，出租车师傅和他聊天，聊着聊着就发现他普通话不够地道，然后这个出租车司机就问我的朋友是哪儿的人，

我那个朋友说是新加坡人，那个师傅就说："新加坡人不就是中国人吗？怎么中国话都说不好呢？"这句话在我看来并不意外，这也许是今天不少中国老百姓很容易起的一个反应。但我们仔细来看这句话，请想想看这里面有多少个简单的等号划上去了？为什么新加坡人是中国人？他可以是华人，但他不一定是中国人。为什么华人就一定要说好所谓的中国话？而这种中国话又是指哪一种中国话呢？是普通话吗？新加坡人很多人讲闽南话，那叫不叫中国话呢？就算他也讲华语，也就是我们的普通话的时候，他们的口音是不是要像北京人这样才叫讲好中国话呢？这类问题是今天很多在中原地区的中国人不会反省的问题。

这件事之后我就很喜欢拿这事和大家开玩笑，我和同学们讲"大家知道吗？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建立了两个国家。"下面就有人说："梁老师要支持台独了。"我说："还有一个是新加坡嘛。"其实这也是个很特殊的挑战，新加坡有七成五是华人，假如我们一向认为既然是中国人，我们讲 Chinese、华人、中华民族, 我们是一个民族国家，所谓民族国家就是一个占主体的民族建立成一个国家的话，那我们怎么理解新加坡的状况？新加坡当然有印度人、马来人，但它到底是个以华人为主的社会，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离开中国这片地区之外有那么多华人参与构建的一个国家。它跟我们在文化上、民族上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后来，我再想下去就发现其实整个南洋地区特殊跟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他从来对国界的某种蔑视，而这个蔑视是在过去我们中国现代史的书写中不被注意到的，因此我们会有很多想当然的对于海外华人、尤其是南洋华人的想象。举个简单的例子，明年是辛亥百年，辛亥百年其中一个必然要提起的话题就是海外华侨的贡献。孙中山曾经说过华侨是革命之母，他一直强调他在华侨身上得到多少帮助。其实不止是他，当时的立宪派、保皇党、康梁也在南洋获得非常大的支持。对这些海外华人或者南洋华侨，我们过去的理解是这批人是爱国华人，身在海外，心在中华，心怀故土，我们是这么来讲他们的故事的。但如果你仔细深入到他们原来出生地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这类故事其实是不完整的，里面有很多裂缝。

比如说有一些非常有名的海外华人，像伍连德，我最近看到一篇论文研究他，是新加坡的黄贤强教授写的，写得非常出色。伍连德是谁呢？伍连德是槟城出生的一个南洋华人，他在剑桥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然后被袁世凯请到北洋去做卫生总管，当时东三省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鼠疫，他作为总指挥去控制鼠疫，虽然最后死的人不少，但是假如没有他的话会更严重。他做得非常科学、非常现代，第一次系统地将西方刚刚出现的公共卫生管理系统引入中国，后来全世界各国的防疫专家，包括日本、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的专家组成鼠疫研究会议，推举他当主席，那一年他才 30 多岁，被认为是中国人的骄傲。伍连德后来在抗战后期离开中国，这让他许多中国朋友觉得很惊讶，说你怎么不留在我们这儿参与祖国抗战？他回南洋了，从此都没有回来。直到今天，医学界很多人还都会提到他、纪念他，说他是一个爱国华侨。但你仔细挖掘他的生平，你会发现其实他不只是因为爱国才到中国的。他当初为什么要帮袁世凯做事？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是他当时在南洋的生活、工作并不如意，本来英国殖民政府是很重用他们这种本土华人的，但是当年英帝国自己培养出大量的殖民人才，所以他就没办法在那边生活得太好，他的心态相当于今天我们在中国混得不好了，发展有问题，这时候恰好美国请我去做什么事，我就应聘到美国去发展。其实伍连德不应叫回国，他是去中国，因为他原来就没有觉得这个"国"是"祖国"的概念。海外华人当然都知道他们是从中国来的，但是不是真的在政治上认同这个国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当年很多海外华人支持中国的建设、革命，都有各种各样奇怪的理由，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因为宗教的关系。很多海外华人是基督徒，他们来到中国，参与办学，像创办复旦的那一批人，包括李登辉校长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其实中国话都不太会说，根本是个外国人，他的中文是来到上海之后才学的。那为什么要来中国呢？他觉得这是基督教慈善事业的一部分。这些海外华人他们的确是华人，他们跟我们一样祭祖，他们跟我们一样有各种各样的节庆假日，他们跟我们一样有中国姓名，他们会说某种中国的方言，但是他们已经不是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下的中国人了。十九世纪末是有一次再次民族主义化的活动，因为孙中山的影响，有这样一个过渡现象。他们之中的確是有很多爱中国的华人，但我们现在理解这些海外华人，不能说他们爱国是理所应当的，恰恰相反，他们的爱国是需要去解释和论证的。

我今天在报上发了一篇文章，是关于一个我很多年来都很着迷的人物——辜鸿铭。我们提起辜鸿铭的时候都说他是文化怪杰，我翻遍大陆关于他的著作、传记，发现大陆人谈到辜鸿铭的时候，说他怪，但怪在哪儿？基本都是说都民国革命了他还支持帝制，张勋复辟就他一个人叫好，永远戴个瓜皮小帽、留个辫子，然后用英文、德文写书告诉老外，说中国男人纳妾很好，女人缠脚很对，就是这么一个怪家伙，但他的学问很大。

我觉得这些说法都没有掌握到他真正的怪。在我看来，他最怪的地方是什么呢？他是一个Peranakan，就是土生华人。土生华人是什么？这要追溯到明朝的时候，一些中国广东、福建的移民到了南洋地区，世世代代住在那儿，跟当地的马来女子通婚，混血产生了一个社群，这个社群后来发展壮大，规模越来越大，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族群。他们的衣服、穿着、家具、摆设、传统节庆跟中国广东、潮汕还有闽南地区都很像，但是又有点不一样，带有一些马来色彩、印度色彩。他们都有中国姓名，但他们的语言不是中文，他们已经不会讲华语了，他们讲的语言是 Baba Malay，是一种混合了闽南话的马来文。他们也看中国的书，比如看《三国演义》，但那个《三国演义》是用峇峇马来文写的《三国演义》。他们也唱戏，那种戏有闽南歌仔戏的感觉，但是会用马来文去唱。英国殖民者到来的时候，他们这个族群特别受重用，因为他们精明能干又擅长变通，所以他们就成了全世界华人中最早西化的一个群体，说外语着西服，而辜鸿铭就是这种人。

他其实从小没有说中文的机会，他妈妈是高加索裔，所以辜鸿铭根本是混血儿。他小时候跟他的义父去爱丁堡读书，在欧洲的 11 年学了 9 国语言，然后回到槟城。历史上说有一个人改变了他对中国的想法，这个人叫马建忠，是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和辜鸿铭在新加坡一宿长谈，谈完之后辜鸿铭恍然大悟，发现自己是中国人，三天之后离开新加坡，后来就回国了。回国之后辗转帮张之洞做幕僚，这就是我们后来所知道的辜鸿铭。

在我看来，前半段那个辜鸿铭太怪了，这么一个 22 岁前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的人，他甚至不会说中文，就在和马建忠谈完一晚后决定回中国。对于马建忠跟他谈的那一晚话我发现很多历史学家都没去研究，我一直关心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他们是用什么语言谈的。辜鸿铭不会中文，他顶多会一点闽南话，马建忠是江苏的，所以他们不可能用任何中文去沟通，他俩说的极有可能是英文或法文，你想象一下两个人用英文或法文谈完之后，一个过去不晓得自己是中国人的人，忽然发现“天啊，我是中国人，扎辫子多好啊”，然后回来就变成最坚定、最保守的辜鸿铭了。这难道不是很荒谬吗？对我来讲他的怪是怪在这儿。

我之前讲的那种华人等于中国人、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所以要说中国话，这种思路我称为“中原中心主义”。“中原中心主义”真正受到挑战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南洋世界跟中国重叠的部分，也就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大南洋：北起厦门、漳泉，然后到潮汕，跟着到广东的珠三角，然后往下到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缅甸。

这样一个南洋世界，它有自己的海外华人跟其它民族的关系，但同时也扩散到中原地区的南部疆域。在这个南疆地域中，我们拿珠三角来讲，珠三角地区跟南洋这片土地的关系、海洋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珠三角对北方、对中央王朝有一定的认同感，但他们又随时准备好叛离。从唐朝开始，驻广州刺史的一个任务就是要防止乱民跟外族通婚。现在的番禺那时是港口，住了一万多个波斯人，当时广东人就很爱跟这些波斯人通婚，长安那边看了很不高兴，朝廷就叫刺史盯着广东人，别让他们通婚。但广东地区的人从来都很混乱，又很强悍，同时又愿意出去冒险，跟闽南人一样，所以这两个地方的人大量移民海外。我们今天老说郑和下西洋是如何推动华侨在海外的地位，其实我们忽略了一点，当初郑和下西洋其中一个要做的事是要抓回这些“乱民”，有文字记载他到菲律宾时抓回来多少“乱民”。

福建跟广东沿海的居民从来都不管这些所谓的规定，坏起来的时候还要勾结日本人搞倭寇，其实倭寇基本上都是闽南、广东人，当然最后是袁崇焕去镇压他们，他也是广东人。所以这个地方从来就有很强的一种混杂的分离心态，或者不一定是分离，他们只是喜欢往外，于是就到了马来西亚、新加坡。今天我们去看这些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的祠堂，依然香火旺盛，这时候很多人又会很本能地解读为海外华人热切的爱国情怀，说他们在当地生活了几百年，还是那么爱国。其实他们不是爱国，他们是爱乡，是一种乡土情怀，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我最后再讲一个故事作为总结。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里梁朝伟离开张曼玉时说：“我明天就去新加坡了。”这句话他说得非常轻易、随便，就相当于一个北京人跟别人说我明天去昌平一样，好像在隔壁。而我想指出的是这就是当年一种真实、普遍的认知。对香港人来讲，去新加坡，去吉隆坡，去广州，我们并不觉得是去陌生的国度。我们有一个港口跟城市网络的概念，我们处于广东、福建等中原地区的南疆地带，我们跟大南洋之间的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不是同一个国家的关系，甚至不是同一个民族的关系，是最单纯的港口城市的网络连接。刚才说辜鸿铭在槟城出生，他到新加坡打工完全不觉得是离乡背井，就像去隔壁一个城市，没什么大不了。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没有独立之前，香港、澳门、珠三角这些城市跟南洋的关系就是这样接近，没有任何断裂，没有分割之感，我们从来不去担心我们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人，我们不被这种问题困扰，我们很自然地来来去去。胡文虎、胡文豹两兄弟在缅甸起家，然后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办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星洲日报》的前身，在他们兄弟离开之后，在那个大南洋时代结束之后，就被迫分裂为香港的《星岛日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和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其实三家报纸原来都是一个缅甸华侨创办的。



过去那个不分国界的时代其实离我们没多远。今天在我们面对非常猖獗的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背后的中原中心主义的时候，我们需要用这样的一种南方海洋的角度来重新看它。当年我看《河殇》会觉得很搞笑，它里面说中国文明就是黄河文明，在河流里面，在黄土高原上面，现在封闭太久了要涌向大海，迎接蓝色文明。我们一听就知道这就是你们北方佬搞的东西，我们在香港天天面对的就是蓝色文明。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梁文道：作家、文化评论人。原文链接：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abb06ba74eddd914 ）

【返回目录】

# 8-7 葛兆光：也说“中国境域”

**“现在谈论历史上的某某‘国家’往往等于是在说某某‘王朝’，因此‘国境’就是当时的‘疆域’，因此完全可以坦然承认，历史上的‘国境’是移动的，古代‘中国’是中心清晰边缘移动的王朝，由于各个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因此历代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疆域即空间边界是常常变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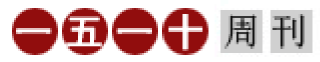


最近，我受邀参加一个小型论坛，讨论什么是“中国境域”，主办方给我发的电子邮件中，用“国境在那里，中国在这里”这样两句很有意思的话，来暗示这个论坛讨论的主题是“国境”和“中国”，我很快理解为，这暗示了“国境（政治领土的范围）”和“中国（文化认同的空间）”的差异，这让我很感兴趣，因为我曾经撰文讨论过这个话题。所以，当我看到邮件的时候，一方面想起了杜甫的那句诗“国破山河在”，和明末士大夫说的“非亡国，乃亡天下”，觉得“山河”、“国”和“天下”，似乎在传统中国的观念世界里，有些不一样。一方面想起了近代以来一直到现在，中国和周边世界关于国界、疆域、历史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间，也涉及到了“国境”、“国家”和“中国”，也就是历史疆域、政治版图和文化空间的种种问题。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一些感想：

1、国境的话题：不止是钓鱼岛、南沙群岛、麦克马洪线

关于国境和国家，是一个绝大的话题，它涉及到的绝不仅仅是现在存在领土争端的那些地方。比如中国和日本之间有争议的钓鱼岛，中国和越南、印尼之间有争议的南沙群岛，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等等。

不妨从近年来的韩国历史教科书说起。这些年来，历史教科书常常成为关注的话题，是因为培养和铸造年轻国民的历史观念和文化认同的历史教材，由于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文化和民族起源、宗教信仰和文化主流、历史疆域和民族空间等等问题，在各种教材中最容易引起认同、激动和冲突。而韩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出现了一些让人瞠目结舌的说法，一方面表明在思想领域中，韩国国内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方面说明在知识世界中，韩国历史认知和中国历史认知之间的冲突。比如，朝鲜比中国历史悠久，檀君的故事和传说，高句丽在唐宋时代的版图的夸张说法等等。其实，人们早已经注意到，自从东北工程和高句丽申遗以来的种种争论。





这表明国境、国家的问题，在看上去疆域已经划定的现代，仍然有很多历史阴影在纠缠，这使得现代存在于历史中，历史存在于现代中。

比韩国要早得多，日本对于“中国”疆域合法性的质疑从明治年间就开始了，那个时代，追随西方民族与国家观念，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潮流和“亚洲主义”意识的崛起，日本一部分东洋学研究者，一方面是对于中国“四裔”如朝鲜、蒙古、满洲、西藏、新疆有格外的关注，而不再把中国各王朝看成是笼罩边疆和异族的同一体，一方面是把这一原本只是学术研究的取向，逐渐变成一种瓦解中国现代国家合法性的观念，这在二战前后的日本历史学界形成热门话题。比如 1923 年，矢野仁一出版了他的《近代支那论》，开头就有《支那无国境论》和《支那非国论》两篇文章，矢野认为，中国不能称为所谓民族国家，满、蒙、藏等原来就非中国领土。1943 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他更在广岛大学的系列报告中提出了超越中国，以亚洲为单位的历史叙述理论，此年以《大东亚史の构想》为题出版。恐怕，这种想法至今还有很多痕迹依然留存。

关于国家疆域的现实问题，不仅会以“历史”的形式反复出现，而且会在“当下”的不同时段反复浮现。这些问题不仅在东北亚出现，而且弄不好还会出现在四面八方，比如东突问题、西藏问题、蒙古问题，当然还有台湾的问题，显然，原本在现实政治意义上具有合法性的“国境”，在面临种种质疑，而在历史上和文化上本来天经地义的“中国”也在面临种种挑战。正如过去我在题为《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的论文中说的，这挑战还不仅仅来自现实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甚至还来自种种历史的理论和方法的，比如来自东亚史或区域史、征服王朝史、同心圆理论、后现代历史学等等。这个问题需要郑重讨论。

2、国境、国家、近代民族国家——中国的特殊性或者是普遍性

要讨论这个话题，先得从所谓“民族国家”究竟何时形成说起。因为，所谓合法政治领土的“国境”概念，据说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关，而传统帝国是无所谓疆域的合法性的，而一般理论界的说法，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从欧洲近代开始的。在目前所看到的关于“民族国家”的种种论述中，基本上是以近代欧洲为背景的。所以，在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一开头罗列的“可以作为学子初入门的参考”的书单，除了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之外，基本上都是讨论欧洲历史的。可是，这种关于民族国家的讨论是否能够适用于东方世界尤其是中国呢？

我一直觉得，中国历史不必按照欧洲历史来截长续短。中国式的近代民族国家，大概从宋代就开始形成，这恐怕比欧洲时间还早。当年，Morris Rossabi 编了一部讨论宋代中国国际关系的论文集，名 China among Equals，意思是从那个时代开始“中国棋逢对手”（也有人译为“势均力敌国家中的中国”），正如它的副题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 显示的那样，10 世纪到 1 4 世纪，中国和邻居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到了宋代，中国不像以前的唐帝国那样笼罩天下，北方的辽和西北的夏，后来的女真与更后来的蒙古，逐渐使它成为“诸国”中的“一国”。尽管宋太祖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但是在宋真宗以后的宋、辽间外交文书，已经常用“南北朝”、“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契丹皇帝



阙下”的说法，所以，陶晋生指出宋人有“多元国际系统”，“宋人对于国界的重视，足以推翻若干近人认为传统中国与外夷之间不存在‘清楚的法律和权力的界限’的看法”。

这使得中国第一次有了明确的“国境”，也有了国与国对等外交的意识，在宋史中我们看到，“勘界”即边界的划分，“互市”即边界开设的等价贸易，“聘礼”即对等国家使节的礼仪等等，都开始告诉人们“对等国家”的存在，这在唐以前的中国是几乎没有的。这一民族和国家边界意识的形成，直接后果是使得中国主要是汉族士人不得不严肃地面对“他国”与“异国”，严肃面对的结果是三个：第一个结果是，他们开始对“出入（国）境”加以限制，除了勘定边界之外，他们还要限制“外国人”的居住区域，要限制“中国人”的外出范围，涉及技术性的书籍和通晓这类知识的士人，不能出境到异族区域，以免知识和技术的外传，这说明知识、人员和国土，已经与现代民族国家一样，有了严格的边界。第二个结果是，国家的完整性和正当性成了不容置疑的“国是”，如果说唐代人还可以对“敌国”表示好感，对那些对外战争表示反感，那么到了宋代，“爱国”在政治、社会甚至文学领域中都有了绝对的正当性。第三个结果是，对于外来的宗教、习俗和其他文明，汉族士人有了一种基于民族立场的警惕，他们不再像唐人那样欢天喜地地拥抱这些新鲜东西，而是怀着戒惧的心情，对外来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态度（如佛教、火葬、胡服）。这与宋代始终处在异族威胁下有关，对于异文明的抵制普遍地表现在对固有文明的阐扬，北宋历史学上的“正统论”、儒学中的“攘夷论”、理学中特别凸显的“道统”说，都在从各种角度重新建构着汉族文明的边界，拒斥着异文明的入侵和渗透。

因此我们说，从文化的意义上说，近代民族国家疆域和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在中国反而比欧洲早，所以，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说，宋代是中国的“近世”。通常人们常常觉得，欧洲的“近代”，也包括“近代民族国家”要比中国更早形成。也许，欧洲的民族国家确实是近代的事情，然而，中国的民族国家，在很多方面和欧洲不同，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要素，在中国也找不到，但是，为什么欧洲才是“普遍”的而中国就是“特殊”的呢？也许，中国这种民族国家形成史，也是同样合理而自然的一个生成过程。中国这个“国家”，其实早已形成轮廓。

### 3、什么是近代的“民族国家”？欧洲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

综合各种现代的理论，一般认为，与传统帝国不同，近代民族国家的要素是：一、有明确的国境存在；二、有国家主权意识；三、是国民概念的形成与整合国民的意识形态支配，即以国家为空间单位的民族主义；四、是控制政治、经济、文化空间的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五、由各国构成的国际关系。

但这是以欧洲尤其是近代欧洲的历史为思考背景的定义，并不一定适用于东方诸国特别是中国。和欧洲不同，中国的政治疆域和文化空间是从中心向边缘弥漫开来的，即使不说三代，从秦汉时代起，语言、伦理、风俗和政治就开始把民族在这个空间中逐渐固定下来，这与欧洲认为“民族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晚近的新现象”不同，因此，把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区分为两个时代的理论，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意识观念和国家生成历史。在中国，并非从传统帝国到民

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着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近代民族国家恰恰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传统中央帝国意识依然残存于近代民族国家，这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历史。

也许，很多人会想到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与“朝贡体制”，觉得古代中国以朝贡体制想象世界，并不曾清楚地意识到“国家”的边界。但是，现在的研究表明，古代中国在很早就形成了以汉族文明为主流，汉族生活区域为中心，只是通过朝贡、羁縻、册封、征服等等形式，维系周边异族和区域，构成“中心清晰、周边移动”的民族国家，仔细考察可以知道，这种观念中的“天下”，常常只是一种想象，并不一定是实际处理“中国”的国家与国际问题的制度或准则。这当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问题，如果简单地说，大体上可以注意三点：（一）中国以汉族为中心的族群与国家，在地域空间上是重叠的，这使得民族和国家的“边界”很容易清晰地固定下来。前面说到，从宋代起，在辽夏金元压迫下的勘界行为、海外贸易确立的各种制度，和清晰的知识与财富的界限，加上和、战之间的外交谈判，已经使宋代中国就有了国境存在和国家主权的意识。（二）由于同一性伦理的逐渐确立，宋代以来建立的历史传统、观念形态和文化认同，已经很清楚地形成了汉族中国自我确认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谓“华夷”之辩、所谓“正统”之争、所谓“遗民”意识，在宋代以后的形成，本身就是这种国家意识的产物。（三）从宋到清，中国在东方世界的国际关系已经形成，尤其是自明清以后，明清王朝、朝鲜、日本等国家之间的互相交涉，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国际”，只是这个“国际”原本的秩序，在后来另一套新的世界秩序冲击下逐渐崩溃，终于被取代和遗忘而已。

4、历史、文化和政治：三种认识国境、国家与中国的维度

因此，关于“国境”、“国家”与“中国”，我以为，有三点特别值得重视——

首先，在历史意义上来看“国境”、“国家”与“中国”，首先要明确，现在谈论历史上的某某“国家”往往等于是在说某某“王朝”，因此“国境”就是当时的“疆域”，因此完全可以坦然承认，历史上的“国境”是移动的，古代“中国”是中心清晰边缘移动的王朝，由于各个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因此历代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疆域即空间边界是常常变化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反映的各个时代的中国。因此，一方面，不必以现代中国的政治边境来反观历史中国，否则，我们难道要恢复汉唐时代的庞大疆域，甚至是蒙元时代无远弗届的广大领土？抑或回到长城之内甚至固守南宋的半壁江山？如果有这种对于历史的豁达看法，那么，高句丽不必是“唐王朝管辖下的地方政权”，吐蕃也不必在当时“中国（大唐帝国）版图”，现在的东北、西藏当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控制范围内，但是，历史上它们却并不一定是汉唐宋中国的领土；另一方面，也不必简单地以历史中国来看待现代中国，不必觉得历史上安南曾经内附、蒙古曾经由清帝国管辖、琉球曾经进贡，就觉得现在无法容忍和理解现代越南的独立、外蒙古与内蒙古的分离，和琉球最后归于日本，同理，韩国人也不必因为原来曾经属于高句丽的东北部分地区，现在已经归入中国版图，成了中国合法边境内的地区，而觉得伤害了朝鲜的民族感情。

其次，在文化意义上来看“国境”与“中国”，应当承认，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它作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基础，尤其在汉族中国的中心区域，是相对清晰和稳定的，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明推进之后的中国，具有文化上的认同，也具有相对清晰的同一性，过分强调“从民族国家（中国）拯救历史”是不合理的，历史上的文明推进和政治管理，使得这一以汉族文化为中心的文明空间和观念世界，逐渐从中心到边缘，从城市到乡村，从上层到下层扩展，至少从宋代起，已经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实际的”，而不是“想象的”，所谓“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新理论的有效性，似乎在这里至少要打折扣。当然这种“文化”有时是超越国境的，它随着这一文化共同体中人群的流动和迁徙，形成超越国家、却享有共同文化、彼此可以认同的文化群体。

再次，必须明确的是，从政治意义上来看“中国”，现在的“国境”是应当尊重的对政治领土的规定，它标志着一个合法政府的控制范围，在这个政府的合法性没有受到质疑的情况下，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对它的蔑视都会受到回击。

最后需要指出，“国家”概念常常是被混淆的。有时人们口中的“中国”常常只是等同于一个“王朝”，或者常常只是某一“政府”。政府即政权是否可以等于“国家”，国家是否可以直接等同于“祖国”？这是一些仍然需要明确的概念，一些政治认同常常会影响到人们的文化认同，甚至消泯人们的历史认同，这是很麻烦的事情。过去，“朕即国家”的观念曾经受到严厉的批判，人们也不再认为皇帝可以代表国家了，可是至今人们还不自觉地把政府当成了国家，把历史形成的国家当成了天经地义的祖国，很多误会、敌意、偏见，就恰恰都来自这些并不明确的概念混淆。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史。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10284 ）

【返回目录】



# 8-8 黄晓峰：葛剑雄谈统一分裂与中国认同

**“中国认同的观念，是在分分合合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中国认同的观念，是在分分合合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政权、民族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他们是如何对待天下、王朝、正统、分裂的？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指出，不同时期、民族、地区对中国认同有不同的看法，扩张的概念绝不仅仅是文化，不能简单地都认为是正义。

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认同有什么区别？

葛剑雄：中国的天下观起源得比较早，并且延续时间很长。直到鸦片战争后，才受到世界的全面挑战。明朝时利玛窦绘制了世界地图，士大夫见所未见，却都认为是海外奇谈，所以并没有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要求清朝对他们不得以夷人相称，并订入条约。从只有理藩院到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根据《辛丑条约》设立外务部。这说明在法律上，清朝已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是世界的一员了。从天下之中到世界的一员，是亘古未有之变局。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以天下观为中心书写的历史，主要是以中原华夏诸族的记录延续下来，通过他们影响到周边，包括汉语文化圈中的朝鲜半岛、越南、琉球甚至日本。

但是中国很多地区其实并非自觉接受了中原的天下观念，因为他们没有太多记录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也经过华夏族的记录、加工以至歪曲。如果他们的记录还在，那么不可能一开始就自觉接受中原王朝对他们的统一，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征服、侵略甚至毁灭。

我们的历史上说唐太宗是少数民族的“天可汗”，认少数民族为赤子。但是我们现在发现突厥人留下的碑文，他们对自己亡国，对唐朝对他们的杀戮，把惨痛的历史记录下来，并不是“天可汗”。这是史家一厢情愿。我们可以想象其他少数民族也不可能是自觉接受。清朝“改土归流”以后建学校，开科举，也是从文化层面整合他们的手段。孔孟思想从中原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难道都是非华夏地区仰慕华风的结果吗？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汉族文化程度比较高，一向是主张文武两手的。儒家强调德，而不是兵。但事实上不是不用兵，到明朝王阳明率军队对瑶族和僮族的征服，以及乾隆对大小金川的征服。更早一点的，汉武帝的时候，在海南岛建了珠崖、儋耳二郡。到汉元帝时不得不放弃。主要的原因是地方官贪赃枉法，对岛民很残酷。岛上妇女的头发长得很好，他们就专门去收集人家的长头发。岛上居民不断反抗，最后只能把行政机构撤销。这说明在统一、同化的过程中，绝对不是都得到少数民族拥护的。

统一和分裂是现代观念，那么古代分裂时期的各个政权是怎么看待“中国”的？他们是否意识到分裂？

葛剑雄：我认为统一的标准，是后代的政权恢复前代政权的疆域。但是如果当时人都认为统一了，就不存在分裂的问题。这里有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主客观标准是不一致的。北宋建立的时候，离唐朝的疆域差得很远，但只是不接受燕云十六州分裂出去。后来北宋跟辽朝划分了疆界，也就是承认燕云十六州不属于自己了，不再强调没有完成统一。云南的大理国，原来是唐朝的疆域，之后分离出去成为南诏，然后又变成大理。北宋赵匡胤开始就很明确，大渡河以南“非我所有”，所以整个宋朝都没有提要统一大理，相安无事。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宋朝当然不能算统一，连今天的北京都在辽的手里。到后来，从辽朝来说，因为治下主要的居民都是汉族，高层很多人也汉化了，所以他们也把自己当作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人没有世界观念，虽然天下可以逐渐扩大，但是直到清朝，晚清的大多数人一直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和主要部分，其他不过是蛮夷。外国人都被认为是夷，民间则称为番鬼、鬼佬、外国赤佬。虽然也知道天下还有其他的国家，但是自始至终认为越远的地方越落后、越野蛮。这点没有动摇过。对周边，要么认为是中国的藩属，要么认为他们连做藩属的资格都不配。古时要表示皇帝声名远届，会用“重译来朝”或“九译”，说明远人来朝拜需要多重翻译；用“梯航来朝”，说明他们需要跋山涉水。可见古人知道外面有其他的文化和政权。也正因为这样，周边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或想要统治中原地区时，不可能保持自己原来的观念，必然要接受自己也是中原的一部分，跟中原华夏没有区别，这样才能统治。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

中国的少数民族对中国的统一贡献很大，他们进入中原，与中原结合，就把原来占据的边疆的地方也纳进来。明朝建立后，蒙古人退回蒙古高原，明朝认为统一的事情已经完成了。明初并不是没有这个实力，明成祖也曾打到蒙古高原，明朝最强的时候西到哈密，他们认为这就够了。以明朝初期的实力，如果真的打过去，消灭蒙古、察合台汗国的残余，并非没有可能，但它没有这样做。到清朝时，将蒙古族的地方与内地合在一起，平定天山南北路后也没有放弃。中国现在的版图，很多是当地民族先开发，等到它们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疆域就扩大了。汉朝的时候，汉朝与匈奴以长城为界。汉宣帝以后开始，匈奴与汉朝和好，“长城以北，匈奴有之，长城以南，天子有之”。在中国的观念里，也知道长城外面还有地方，但是只要中原就够了。公元前 60 年，西汉建立西域都护府，但是这种统治，与中原是完全不同的，最多是军事监护性质。当地的君长一仍旧章，不需要建立郡县。中国历史上纯粹由汉族建立的政权，这些地方一般是不要的。并不是他们没有能力去夺取，而是觉得没有必要。甚至认为这些地方的居民作为天朝的臣民还不够资格，没有开化。另一方面，也是实际统治的能力问题。汉代在西

域也最多派几千人，而且他们还需要屯田，否则要将粮食从内地运到那里是不可思议的。真的要行使国家主权，还是要动用当地的人。比如陈汤，曾私自攻击匈奴郅支单于，当时他背着朝廷调动西域六个小国的军队，从内地派兵是不可能的。唐朝真正能到达咸海之滨、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只有三年。而且是因为当地波斯国内乱，一个王子投降唐朝，后来内乱平息，唐朝就失去这块地方了。但是唐朝也不当一回事，因为这里本来就是蛮夷的地方。唐朝在安西也只是建立四个镇，主要是驻防、监护职责。唐朝初年灭了东突厥、西突厥，并不想像内地一样维持统治，只是想保证安全、交通线。盛唐到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的西部疆域已经退缩回来很多了。到了安史之乱以后，连河西走廊都被吐蕃占领了。但是唐朝人并不认为这是分裂，因为内地还是完好的。这些地方是可有可无的。等到晚唐五代时期，当时人才认为是分裂了。北宋建立，一般人都认为是统一了。我们传统的历史书，都把公元 960 年开始看作中国又进入统一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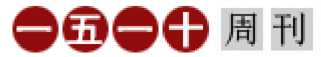
当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时，他们是如何认同“中国”的呢？

葛剑雄：少数民族只有军事上的优势，没有文化上的优势。游牧民族也有长处，比如赵武灵王向他们学习骑射，中原军队由马车作战变成骑兵。但是游牧民族不拥有总体上的优势，一旦进入农耕地区，他们的优势就没有了。秦汉时匈奴始终没有入主中原，在与汉族对抗的过程中，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生活方式。汉文帝时的一位宦官中行说出使匈奴后，投靠了匈奴。他曾经跟后来出使匈奴的汉使辩论。他认为匈奴的生活方式、观念是很合理的，符合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比如建议匈奴人不要吃汉人送来的食品，不要穿汉人的绫罗绸缎，应该放在地上用马踩坏。匈奴的风俗习惯不应随便改变。住帐篷、男女老少睡在一起，这是很正常的。丈夫死了，妻子要改嫁，因为匈奴人的生育率、存活率低，所以要充分利用妇女的生育能力。但是匈奴人进入内地，这个优势就保持不住了。到了东汉后期，匈奴逐渐迁到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并大量在那里繁衍，这时是西晋初年。上层人物已经迁到洛阳，通四书五经，跟汉人交往。他们在建立政权时也称为“汉”，说自己祖上与刘邦是结拜兄弟，所以改姓刘，即位的时候从刘邦一直祭到刘禅。一方面自己的民族从牧业转为农业，另一方面统治的对象大部分是汉人，所以只有在文化上主动接受，把自己作为汉人的一部分，这样才能统治。

蒙古人刚到中原的时候，有人就建议，汉人“无补于国”，没什么帮助，要求把他们的地方腾出来，作为牧地。时间长了，慢慢才发现保持农业对他们的帮助更多。少数民族进入中原都有一个过程，开始与汉族关系紧张，以后慢慢关系融洽，逐步汉化。这个过程从早期的匈奴人、鲜卑人、羌人到后来的契丹、蒙古、女真、满族，毫无例外。

中国古代有正统、正朔观念，是不是可以看作是一种对“中国”整体的认同？

葛剑雄：当时很明确，社会的主流，是把统一与王朝联系起来的。比如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其实统一早就不存在了，军阀州牧割据。但是大家认为汉朝还是存在，反对的对象是曹操，没有人敢反对汉朝的权威。打的旗号都是反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臣”曹操。谁要改正朔，另立王朝，那就是谋反了。等到曹丕篡位，人们就认为汉朝亡了。刘备马上称帝，孙权后来也称帝了。称帝之后，大家都认识到苟安一隅是长久不了的。诸葛亮的北伐一方面是以攻为守，另一方面也是以这个手段保持政治上的正统。





五代十国为什么有的称代，有的称国，因为南方的割据政权，自己也明白代表不了整个中国，只是保境安民、割据自肥而已，所以只是称王，甚至王都不敢称，还是用原来的职位。不敢建立自己的正朔，奉中原的正朔。在当时，统一、天下、国家这些概念，他们还是清楚的。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比如元和清，被统一的人们是否都认为只是改朝换代，他们对国家认同采取什么态度？

葛剑雄：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故国是亡了，但是天下不会亡的。明朝结束之后，顾炎武等一些人在讨论天下亡还是社稷亡。有些人认为社稷亡还是小事，如果连文化、法统、传统都亡了，这就说明天下不再是一个天下。明朝亡是不得不承认，但是一般老百姓不认为是天下亡。知识分子则认为天下亡了，因为清朝是异族。如果华夏政权取代华夏政权，他们只会认为这是亡国，而不是亡天下。

北宋后期与金联合灭辽，当时北宋统治者有个误解，认为王师北伐，北方的老百姓肯定会搭“香花楼子”（鲜花建的牌楼）迎接他们。可是到了那里以后，老百姓非但不欢迎，甚至很反感。官员不理解，老百姓说：“即使一匹马对主人都有感情，更何况是人呢？契丹人统治我们两百年了，没有亏待我们，赋税没有加重，科举照样有，凭什么让我们反对他们？”这就是一般民众的观念，认为辽朝也是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却认为，异族的统治与汉族之间的王朝更迭、皇室内斗是两回事。但是这种思想不会一直延续下去，等到清朝的统治稳定了，特别是重视传统文化了，就被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了。倒是在朝鲜的眼光里，认为中国亡于蛮夷。朝鲜的国王大臣对明朝感恩戴德，因为万历皇帝对他们有再造之恩，还曾经策划要帮明朝复国。他们认为异族入主，汉文化亡了。他们认为自己是礼仪之邦，满洲人比他们野蛮。但在中国，毕竟观念斗不过实力，等永历帝被杀掉，清朝统治稳固之后，大多数知识分子承认了。比如侯方域就去参加科举，不应科举就无路可走了。

明朝亡了之后，知识分子讨论过哪些人应该死。一般认为没做过官的人可以不死，做过官的人应该尽节。正面对抗的人几乎没有了。顾炎武、王夫之最后也只是隐居起来，不再继续组织反抗了。比如顾炎武并不拒绝外甥徐乾学给他的资助，而徐乾学是清朝的礼部尚书。他在外游历，官方的资助也接受。清朝统治者也知道，要收束知识分子，必须在文化上把自己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要认同。从多尔衮开始，就有意识地证明明朝不是亡于大清，是亡于流寇，大清是为明报仇的。清朝进一步通过修《明史》等文化活动，证明明朝天命已尽。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理性、合法性，在修《明史》的时候，把史可法等人列为忠臣，把洪承畴等人列为贰臣。同时各地通过修方志，表彰忠烈，所有抵抗大清而死的，官员都是忠臣，老百姓都是义民，妇女都是节妇。通过一系列手段使大家心悦诚服，原来的“反革命”家庭变成“革命”家庭。文脉、乡绅、观念得到延续。同时自称满族也是炎黄子孙，只是迁到北方。康熙、乾隆也都祭拜朱元璋，十三陵继续得到保护，这样证明自己已经继承了中国的正统。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天下稍定，就要为前朝修史，这主要是为了解释天命，这是最大的政治，其他杀戮残暴的小节都可以不计。所以到辛亥革命后，很多遗老说：“自古得天下，无如本朝之仁者。”都忘了明朝末年的抵抗和清朝的杀戮。从武装镇压到征服人心，都是这样一个过程。清朝最初满汉分得很清，后来行政管理还是不得不借助汉人。康熙时重用高士奇，就是看中他的能力，连明珠都要看他的脸色。汉化之后，汉人的势力当然就强了。在地方上，将军



都是满人，但是行政、文化上还是汉人官员多。太平天国之后，满人在地方上风光不再，湘军、淮军体系的将领很多成为地方大员。再比如说，女真人的开国皇帝名完颜阿骨打，到修历史时已经改为完颜旻，连名字都改了。后来金朝的皇帝发现一个人都不愿用女真的名字，下令禁止也没用。这些同化是不可避免的。

到了清朝，西藏、新疆、西南也被统一进来了，他们是如何认同“中国”的？

葛剑雄：我们以前解释历史是双重标准，好像中国历史上一切扩张、侵略都叫统一。统一的概念是后面对前面的。比如秦朝的建立，秦国征服六国，还可以说是统一。秦朝扩张到岭南，怎么能叫统一呢？秦朝把周朝的疆域都收起来，这叫统一。对南方百越人来讲，秦朝就是侵略，所以才出现几十万大军过去。《淮南子》里的描述，就像西方殖民主义到非洲一样。当地人埋伏在树林里，半夜里发动袭击，把统帅杀掉，秦朝不得不增兵。秦朝长期在岭南驻军，这就是殖民。我们以前很可笑，说秦朝先进的生产力取代南方落后的生产力，使南方获得进步；如果这种理论成立，那么西方殖民非洲也完全正当了，因为西方的生产力肯定比非洲强。战国和秦朝时，中原没有认为岭南属于中国。当然，秦汉之后，如果岭南要独立，那就是分裂了。扩张的概念绝不仅仅是文化，不能一概都认为是正义的。汉武帝攻打西域，一定要大宛的宝马，为了让自己的小舅子李广利立功，这都不能说是正义的。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没有秦始皇、汉武帝这些人，今天这些地方就不是我们的了，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些征服是正义和进步的。

苗人原来生活的范围很广，被中原汉人从平原逼丘陵，再到深山。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被同化，对苗人来说，这是很痛苦的过程，语言、风俗都被汉化了。由于汉人文化的优势，苗人的上层纷纷改变身份，在血缘上论证自己与汉人的关系。当然华夏群体历来在文化上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不注重血统，再加上没有宗教的冲突，没有异教徒的概念，所以只要接受了汉文化，绝不会在意血统上有什么差异。所以在同化过程中就相对容易，这是比较好的传统。也正因为这样，在大多数地方，汉化是比较容易的。

同化也有生存的因素，因为汉人有限，很多人觉得有这些地方就够了，没有必要向外扩张。在《盐铁论》里，儒生与桑弘羊这些人争论，就认为中原很多地方都荒废了，却移民到边疆苦寒的地方，有什么价值？西汉几千万人开发中原已经够了，不需要到边疆去。除了少数穷兵黩武的统治者之外，大部分人都认为扩张不是正义的。当时对汉武帝也充满了批评，他最后也不得不下轮台罪己诏。从汉到唐宋，对少数民族地区基本维持着羁縻、土司制度，原因就在于汉人没有生存压力。如果有了生存压力的驱使，扩张就被认为是正常的。中原王朝往南扩张，就被认为很正常。因为南边有耕地，可以种田，逐步从江淮之间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直到海南岛。到了清朝，搞改土归流很迅速，就是人口压力造成的。清朝人口从初期的一亿左右到乾隆时期的三亿到太平天国前夕的四点三亿，这么多人口主要在南方增长。这样，南方的苗族、彝族、土家族就感到压力，改土归流以后，设立府州县，大批官员、读书人移民过去。新开发的地方科举名额比较富余，汉人就移民过去冒籍参加科举。清初的时候，泉州漳州的读书人考不上举人，就迁到台湾参加科考。这个过程就是在行政权力的推动下，包括文化的同化速度就加快了。

（黄晓峰，《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记者。葛剑雄，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原文链接：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11/26/704208_s.shtml ）

【返回目录】






# FMN 新闻

**陈光诚**

《纽约时报》曝**陈光诚**赴美转折内幕，文章说，陈光诚之所以能赴纽约大学，主要是因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直接向中国大陆国务委员戴秉国提出交涉所致。报道指谈判过程有无法预测的转折、威胁、因应威胁的对策，有时还有些滑稽小计。
新闻：http://fmn.cc/J8Z31X

据美国之音报道称，因张健等人翻墙进屋后打伤家人，**陈克贵**为自卫用刀砍伤对方，但他的母亲却被控包庇窝藏，陈克贵的妻子刘芳亦失踪，陈光诚表示他母亲很担忧家人的安危，陈也呼吁外界关注此案，因沂南县不会做出公正的处理。
新闻：http://fmn.cc/J8Zr0p

5 月 11 日，律师斯伟江在微博中证实，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已经于 2012 年 5 月 9 日 9 时，以故意杀人罪被沂南县公安局执行逮捕。其母任宗举被控犯有窝藏罪被刑拘，现取保候审。
新闻：http://cn.fmnnow.com/?p=5516

5 月 16 日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就最近有台湾的“立委”表达了希望组团到大陆来探视**陈光诚**的意愿，询问国台办的态度，发言人杨毅表示不太了解。但他认为这不是两岸间正常的交流。而且称民进党“提出这样的要求，显然是别有用心。”
新闻：http://fmn.cc/J05uRs

**云南巧家爆炸案**

据媒体报道称，5 月 10 日上午，**云南昭通巧家县**花桥社区办公室发生自杀式爆炸事件，原因是农民不满政府强行征地。据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委发布的消息，10 日上午 9 时许，巧家县一个社区服务中心发生一起爆炸案，造成 3 人死亡 14 人受伤。当晚巧家警方发布消息称，事件已导致 4 死 16 伤。
新闻：http://cn.fmnnow.com/?p=5448

当地媒体报道称一李姓妇女，因为不满政府征地拆迁，怀抱 1 岁多的小孩，带上炸药包进入服务大厅的协议签订现场后，点燃了导火索实施自杀式爆炸。不过官方转日又通报称，犯罪嫌疑人为男性，名叫**赵登用**，事件的反转另外界愕然。
新闻：http://fmn.cc/J06jKb



http://cn.fmnnow.com/?p=5505

5 月 11 日新华社记者发文称**云南巧家**爆炸案与征地拆迁无关，疑报复社会。但赵登用身边人不信报复社会这一判断。针对官方通报嫌疑人赵登用悲观厌世，有报复社会心理的说法，他的房东说他精神很正常，而且“上有老下有小，不相信他会做这种事”。
新闻：http://fmn.cc/Jla6DI
http://fmn.cc/M7Yzdy

**巧家县**征地拆迁规定要求“被征地人必须服从，不得拒绝和阻挠。”当地也频现征地纠纷，村民也不相信爆炸同征地拆迁无关。而就在爆炸案发生的 6 天前，白鹤滩镇村民杨玉强在征收签字现场烧了自己的摩托车。更早前的 4 月 18 日，巧家老店镇村民丁发朝因抵制拆迁被殴致死。
新闻：http://fmn.cc/JghZqn

**云南昭通市巧家县**爆炸案件实施者的身份从一开始因征地而实施爆炸的女性，又变为一个 26 岁的送水工，警方还称此事同拆迁无关，是赵登用报复社会。5 月 14 日，云南警方公布了一些视频和 QQ 聊天记录，用两年前赵登用在网络上的留言作为他今年 5 月实施自杀式爆炸的证据，受到外界质疑。
新闻：http://fmn.cc/Mc6572
http://fmn.cc/Mc6c2t
http://cn.fmnnow.com/?p=5597

此前公安局长**巧家县**公安局长杨朝邦表示：“我可以一个局长的名义和自己的前程来担保，赵登用就是此案的嫌疑人。”引发舆论质疑和批评。不过 16 日杨朝邦却否认这一说法，称有确凿的证据证实赵登用是嫌犯。
新闻：http://fmn.cc/J08qNW

5 月 15 日开始，**云南巧家县**爆炸案现场被开始重新粉刷，大厅墙壁与天花板上残留的血迹均被抹去。媒体指赵登用的作案动机，爆炸物的来源，爆炸前 90 分钟叫走赵登用的神秘女子是谁等悬疑，依旧有待警方的调查。
新闻：http://fmn.cc/JfmmbX

**中国、菲律宾在黄岩岛对峙事件**

此前有媒体报道指广州军区和南海舰队已进入二级战备状态，引发各界关注，但 11 日下午，中国国防部即否认上述说法。**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对媒体表示，广州军区和南海舰队等部队进入战备状态的报道不属实。
新闻：http://fmn.cc/J094er

5 月 16 日 12 时起，**中国南海**大部分海域将进入为期两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黄岩岛海域也属于此次休渔制度的控制范围。期间，中国渔政和海监船将继续进行巡逻和执法活动，违规作业的中外渔船，都要受罚。
新闻：http://fmn.cc/Jflm7x

另一方面，**菲律宾**外交部长德尔罗萨里奥 16 日表示，菲希望能与中国很快结束在黄岩岛海域持续的对峙事件，以便两国恢复“正常的关系”。
新闻：http://fmn.cc/J08QnI

**南方降雨洪灾频发**

5 月 10 日下午 18 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冰雹和暴雨灾害侵袭了**甘肃省岷县**部分地区。据最新统计，这次的雹洪灾害导致了已致 53 人死亡 18 人失踪。当地的农作物和耕地受到大面积的破坏，国道 212 线多处被冲毁，其中梅维公路一处公路桥坍塌。
新闻：http://fmn.cc/KJEyun
http://fmn.cc/K0GoQz
http://fmn.cc/J09GRc

同时**湖南**也遭受了暴雨的侵袭，5 月 14 日因连续强降雨，衡阳市衡阳县关市镇汇水中学围墙突然坍塌，，导致 6 名小学生被埋，最终导致 4 名学生不幸死亡。5 月 13 日上午，湖南岳阳市平江县还发生一起大桥垮塌事件，大桥被上游洪水冲下的砂船撞击桥墩导致垮塌，事故导致 6 人失踪。
新闻：http://fmn.cc/JcmUsv
http://fmn.cc/J09zoS

**湖南平江**大桥被撞垮塌，外界质疑其质量问题，官员则称“在农村地区，超载行驶、人货混装、违章驾驶等乱象十分普遍，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农村群众法制观念淡薄、交通安全意识差有着直接关系。”
新闻：http://fmn.cc/Ji8KGh

而 5 月 12 日以来**江西省**发生的洪涝灾害已造成南昌、九江、新余、赣州、吉安等 7 市 41 个县(区、市)91.7 万人受灾，2 人死亡。全省近 5800 间房屋倒塌或严重损坏，4700 余间一般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 69.5 千公顷，其中绝收 6 千公顷。
新闻：http://fmn.cc/Ji8GX4

**西藏、新疆**

5 月 11 日传出消息，**日本**向热比娅发放了签证以便她到东京参加世维会，日本政府就此强调，此次发放签证“是基于国内法，日方进行了审查”。据悉热比娅将不与日本政府官员会面。中方外交部则表示了反对，
新闻：http://fmn.cc/KRKtbd

为期 5 日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娅·卡德尔）14 日起在**东京**举行，此次会议期间除选举新领导层外，还将确定今后的运动方针。热比娅在大会记者会上指，中国当局加强了在新疆的监控与镇压，现在维吾尔人是为了能够存活而斗争。中国外交部 14 日表态对日方允许“世维会”召开有关会议，从事反华分裂活动表示强烈不满。
新闻：http://cn.fmnnow.com/?p=5587

5 月 14 日，达赖喇嘛在**英国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领取邓普顿奖，据悉该奖是为表彰他长期关注科学和致力与不同宗教沟通。达赖喇嘛接受英国媒体专访时表示曾接到中共训练了特工下毒暗杀他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上述报道“不值一驳”。
新闻：http://cn.fmnnow.com/?p=5619

5 月 15 日上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则紧急约见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就英首相卡梅伦和副首相克莱格 5 月 14 日在伦敦会见达赖提出严正交涉。
新闻：http://fmn.cc/Jnnnf0

**其他重点新闻**

独立电影人**应亮**今年一月获韩国全州影展资助制作费拍摄独立电影《我还有话要说》，应亮与一班电影学员以上海杨佳案为题开拍电影，结果完成拍摄后一周，制作队即被国保约谈，家人也被骚扰，应亮更被威胁如果回国就会被逮捕。
新闻：http://fmn.cc/Krj16L

5 月 12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称中共**十八大**将于下半年在北京召开，不过官方媒体此次仍未指明十八大召开的具体日期。此前有媒体称中国将推迟十八大会期引发猜测。
新闻：http://fmn.cc/KVBU4R

近日网上一段视频中，一外籍男子在**北京**宣武门崇光百货附近意图侵犯一名中国女子，遭路人暴打，随后北京警方通报称，8 日晚一外籍男子酒后在公共场所对一女子进行猥亵，该男子为英国籍，持旅游签证。虽然此前公安部已表示将对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工作的外国人采取措施，北京警方本月就已决定开展百日行动严查“三非”外国人。
新闻：http://fmn.cc/K13feS



http://fmn.cc/J44aRa

日前召开的全国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中国** 4/5 的城市不能达到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空气污染严重影响居民身体健康。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区城市大气灰霾和光化学烟雾污染日渐突出，灰霾天数占到全年总天数的 30%至 50%。
新闻：http://fmn.cc/JcvhUN

17 部委近日齐下发通知庆“六一”活动，通知要求“以迎接党的十八大为契机，深入开展党的历史、党的知识学习教育，增强儿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用党的光辉历程和奋斗精神激励广大**儿童**”
新闻：http://fmn.cc/JTMqUH

5 月 14 日**马其顿**总理格鲁埃夫斯基在北京出席“中国-马其顿投资论坛”，有记者提出校车问题，他回应称，“中国捐赠的校车质量非常好，目前它们已在我国各地学校发挥效力。出于对校车生产商的信赖，马其顿政府已从郑州一家客车公司采购了 202 辆大巴车，用于改善我们的公共交通条件。”
新闻：http://fmn.cc/Ko9jnz

继美国大使馆发布北京 PM2.5 监测数据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5 月 14 日开始发布上海 PM2.5 数据（@CGShanghaiAir）。数据发布的首日，人们发现美领馆的监测数据就与上海环保局发布的数据就大相径庭，两者之间一度相差 3 倍。环保部门回应称，“监测结论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两者遵循的评价体系不同。”
新闻：http://fmn.cc/JTVSY9
http://fmn.cc/Ko9i2Y

5 月 15 日有媒体称，还有大量企业涉及铬超标**胶囊**，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公开，而是在地方药监部门监督下“秘密解决”了。而且有药企人士表示，“国家抽检范围不大，地方检测进度缓慢，只能依赖企业自检。”面对这样的情境而且各方都没有更好的办法去破解。
新闻：http://cn.fmnnow.com/?p=5674

5 月 14 日，一网帖曝光在 5 月 8 日凌晨 4:30 及下午 13:00，包括辽丹渔 23979、23528、23536 号等 7 艘渔船被**朝鲜**不明身份人员强行拖到朝海域扣押，且对方要求每船汇 40 万赎金。目前，除一大连湾船东赎回一船外，另 3 艘及 29 名渔民仍下落不明。16 日中国外交部称，正在进一步核实并与朝方保持密切沟通确保中国公民权益。
新闻：http://fmn.cc/Ksqa8A
http://fmn.cc/J0e56U

有媒体报道，曾因 2008 年“4.28”**胶济铁路**特别重大交通事故而被免职的原济南铁路局局长陈功、原济南铁路局党委书记柴铁民，近日低调复出，二者分别就任青（岛）荣（成）城际铁

路董事长、中铁特货党委副书记。该列车相撞事故曾造成 72 人死亡，416 人受伤的惨剧。
新闻：http://fmn.cc/Jflkg4

【返回目录】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三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pdf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mobi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epub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想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点击 Co-China 志愿者在线申请。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论坛（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周刊新浪微博：1510 周刊（http://weibo.com/n/1510 周刊）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　（http://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论坛 Google+：「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　（https://plus.google.com/u/0/102857877921497187856/posts）

编辑：丁昕、冯自强

校订：童亚琦

主编：方可成

版面设计：豆弟

配图：陈楚君

技术支持：毛向辉、舒欣

出品人：杜婷



